

摘 要

徐宗泽是近代外国耶稣会在上海培养的一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作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徐光启的第十二世孙,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天主教会内可谓贡献突出。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耶稣会译著提要》等历史著作,奠定了他是近代较早开始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徐宗泽还长期担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在担任馆长期间他积极收集各地地方志,利用其任职之便支持近代学人的一些文化研究工作。此外,他还在1923-1938年间主编了近代上海耶稣会机会报《圣教杂志》,《圣教杂志》是一份在近代公教报刊界中影响较大的杂志,徐宗泽担任主编后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注重与读者间的沟通,使杂志呈现出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圣教杂志》与徐宗泽一生的传教事业密不可分,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哲学、教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文章。

本文的徐宗泽思想研究一部分在收集整理他各类文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宗教教育及社会政治两方面的思想。处在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徐宗泽对当时公教教育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众多支持者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实践者。同时,徐宗泽从公教角度对国家观、劳工问题、三民主义、战争与爱国等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表现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改良意识及强烈的爱国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总体而言,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关怀,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作为中国天主教内的一个文化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这些都使徐宗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关键词: 徐宗泽 《圣教杂志》 近代中国天主教

Abstract

Xu Zongzhe was a Catholic intellectual who was trained by the foreign Society of Jesus in Shanghai. One of his ancestors was Xu Guangqi who was one of "Three pillars of Chinese catholic" i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Qing Dynasty. Xu zongzh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for the 20th century's Chinese Catholicism .He edited two very important books: *The View of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and *the Translations' Summary of Society of Jesu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se books established his status of a historian about the modern Chinese Catholic history. Xu Zongzhe had administered the Bibliotheca Major Zi-Ka-Wei for a long time. During these times he collected different area's local chronicles actively and supported some modern researchers to use the library's materials to carry out some study. Furthermore , he hold the post of the chief editor *Revue Catholique* from 1923 to 1938. *Revue Catholique* was very famous among the modern catholic periodical publications. Since Xu Zongzhe was the chief editor, the magazine's content became richer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communicate with readers. It turned to more secular and more popular. The whole life of Xu Zongzhe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Revue Catholique*. He published a large quantity of articles about religion、philosophy、education、politics、sociology and so on.

On the base of collecting and arranging all the Xu Zongzhe's articles, this paper will study his ideas o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society 、 politic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ese Catholics carried out a movement "Naturalization of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Xu ZongZhe also attended this movement. He supported many practicabl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atholic education. Meanwhile, Xu ZongZhe used some catholic doctrines to study a lot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questions , such as a country's right and obligation,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war and patriotism., and so on. From all of these, we can know that Xu Zongzh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change . And he was a real patriot. To sum up in a word, all Xu Zongzhe's life embodied his love to the culture research , his devotion to God, his enthusiasm to the catholic career. He is a typical case of many excellent Catholic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China.

Keywords: Xu Zongzhe Review Catholique modern Chinese Catholicism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参与同一工作的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徐文华 日期：2005年6月6日

本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及送交论文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签名：徐文华 导师签名：陈良 日期：2005年6月6日

绪论

近代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是指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天主教会学校在华培养的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或者是自觉接受罗马天主教信仰的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外国天主教各修会在华建立了大量中小学校，其中以法国耶稣会开办的学校居多。这些教会学校在华培养了大批本土神职人员，很多中国教士还借出国留学机会接受高等神学训练。最初外国教会只是想通过培养本地神职人员来协助其管理在华事业，所以很多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只是在教会内从事管理学校、报刊、出版社、孤儿院等大量繁重的工作，充当外国传教士管理中国教会的助手。但随着中国人民民族精神的日益觉醒，越来越多中国基督宗教知识分子不再甘心中国基督宗教事业掌握于外国教会手中这一现实，开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便是一个证明。

外国教会在华培养的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不乏精通多国语言、接受过中西文化熏陶的优秀份子，他们利用能接触到大量中外文献的宝贵机会，积极翻译整理中外经典著作，其中很多成果即使在现在看来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令很多现代学者也是望其项背。他们提倡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传教”政策，为打破近代中西文化间的隔阂，促进两者间的真正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处在内忧外患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基督教理想主义来解释和回应当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希望用天主教的信义爱德来缓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他们亦积极参与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表现出较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化上、政治上、信仰上的独特性，使近代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成为近代社会一个非常的特殊群体。

一直以来，学界比较重视基督新教知识分子的研究，如赵紫震、吴耀宗、吴雷川、徐宝谦等，因为基督新教在中国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影响深远，相比之下，天主教则更多注重信徒数量的增长和教内事务的管理，不太注重与外界社会的交流沟通，由此造成的封闭和保守阻碍了人们对近代天主教历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天主教培养了大批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如李问渔（1840-1911）、潘谷声（1867-1921）、马相伯（1840-1939）、英敛之（1866-1926）、徐宗泽（1886-1947）、朱志尧（1863-1955）、王昌祉（1899-1959）、吴经熊（1899-1986）等等，这些人在近代公教舞台上非常活跃，我们在翻阅20世纪上半叶相关的历史文献时都会发现他们的活动痕迹。关于近代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研究，现在学界关注较多的有“爱国老人”马相伯，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之所以对二

人研究较多是因为他们要求罗马教廷帮助培养中国本土高级神职人员的呼声最高，在推动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中表现非常突出。但还有其它更多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仍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其实他们中间的很多优秀分子非常博学多才，如被认为是“无年无书”的李问渔，他翻译的书达39种之多，其中亦有难以翻译的科学巨著，如《西学关键》8卷；¹如主编近代上海耶稣会机关报《圣教杂志》的徐宗泽，发表大量关于历史、宗教、哲学、社会、政治、心理等方面文章；如1935年获得巴黎天主教大学神学博士的王昌祉，他为中国神父得此学位的第一人，其博士论文收入巴黎“神学史名著丛书”；²如被视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之奇才的吴经熊，他曾汉译《新经全集》和《圣咏译义初稿》等，被学界誉为“译得古香古色”、且“和中国古诗精神相近”，他用英文撰写的《超越东西方》一书叙述了自己对基督宗教的信仰和理解，同时把它与儒、佛、道三教及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希望达到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超越境界，该书在纽约初版，此后先后被译为法文、葡萄牙文化、荷兰文、德文、韩文出版³。

近代这些天主教知识分子们翻译了大量西方宗教哲学书籍，在对一些外来名词的翻译、对如何将中西译文彼此更准确的表达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很多文献在国内保存较少，其中不少资料还为法文，而且系统的宗教、神学思想对于一般研究学者来说理解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所以人们对近代这些宗教学者们所做贡献的认识仍处于比较粗浅的状态。

本文选取近代上海天主教知识分子徐宗泽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研究他一生的活动、贡献及思想等，来对近代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所思所想、思想特点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之所以选择徐宗泽神父，是因为他主编了民国后创办的耶稣会机关报《圣教杂志》，该杂志是一份全国性的刊物，在近代天主教会内影响较大，而徐宗泽一生的活动都与《圣教杂志》联系紧密，任职期间他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广泛，涉及宗教、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法律、经济等很多方面，其言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上海图书馆近现代文献阅览藏有较全的《圣教杂志》，及徐宗泽编辑的很多书籍，此外，本文还将参阅与徐宗泽同时代的基督宗教信徒在某些相同问题上的言论，及当时其它公教刊物上的相关报道文章，如《圣心报》（1887年问世到解放初停刊）、《盘石杂志》（1922年出版）、《新北辰杂志》（1924年出版）、《益世报》（1946年6月15日上海版）、《上智编译馆馆刊》（1946年11月至1948年6月）等，这些共同构成本文研究的文献基础。

现在能找到的关于徐宗泽的资料，除了他在《圣教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

¹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286页。

² 孙金富等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706页。

³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序。

章及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的徐宗泽编著的著作外，关于他的生平记录及其回忆性文章较少，主要是历史学家方豪在其著作《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有一篇关于徐宗泽的传记，在《方豪六十自定稿》中有《我怀念徐润农神父》、《徐神父略历》、《怀相伯与敛之，念万桑与润农》三篇回忆性文章。现存徐宗泽的相关书信有：朱维铮教授主编的《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中收录有马相伯与徐宗泽间的6封书信，历史学家陈垣的后人陈智超主编的《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中有陈垣与徐宗泽间的15封书信，这些书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一些公教历史问题的讨论。其实徐宗泽与近代公教界很多知识分子都有长期的书信往来，如著名文学家苏雪林、历史学家方豪，但这些书信现在都很难找到了。其它一些近代公教报刊对于徐宗泽的活动也有一些零星的记载，如徐宗泽神父于1947年去世后，近代重要公教报刊都报道了关于徐宗泽神父的一些追悼活动，如方豪主编的《上智编译馆馆刊》、《益世报》（上海版）、《益世周刊》等，在《益世报》1947年的6月、8月上，发表有很多公教界人士的悼念文，《益世周刊》第29卷第4期还出版了追悼特辑。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徐宗泽的生前活动也提供了一些信息。

目前学术对于徐宗泽及其主编的《圣教杂志》还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在出版史研究方面，1927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在谈论徐汇杂志时，该书对《圣教杂志》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简要介绍。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阮仁泽、高振农主编的《上海宗教史》一书，在“上海天主教会报刊”一节中以时间为序较详细的讲述了《圣教杂志》的演变历程，介绍了对第一任主编潘秋麓的生平及他担任主编期间杂志内容的特点，第二任主编徐宗泽的生平及他担任主编期间杂志宗教色彩的增强等。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领域自由之风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会史这一领域，研究近代基督宗教的人欲了解当时中国天主教的一些发展状况，都会去查阅《圣教杂志》以寻找相关资料。¹从总体上看，学术界更多是把《圣教杂志》作为近代天主教会的一种文献资料来利用，是了解近代天主教事业发展的一个窗口。至于该杂志第二任主编徐宗泽，人们对他的认识恐怕更多的是通过他编写的两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8年土山湾印书馆）、《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9年中华书局版）。关于他对中国天主教研究

¹ 如学者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在谈到当时天主教会对于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时，就引用了《圣教杂志》1923年11月和1924年8月上关于刚恒毅以教廷专使身份觐见1923年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的报道；在谈到近代中国天主教教区划分历史时，就引用了《圣教杂志》上1924年、1929年的一些教务报道。学者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在谈到罗马教廷对于中国天主教徒参加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事件的态度时，就引用《圣教杂志》1919年11月报道当时教务巡阅使光若翰到中国的一些声明等；1924年5月至6月刚恒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天主教史第一次主教会议，该书就引用《圣教杂志》1924年7月的《中华全国主教公会会议专号》；关于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国籍主教、神父、修女的人数就引用了杂志上徐宗泽的《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国之状况》一文。华中师范大学2003年王薇佳的博士学位论文《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1903-1952）》就引用了不少《圣教杂志》上关于震旦大学成立情况的报道及当时教会的一些教育政策等。

的评价，学界认为他与同时代的天主教知识分子黄伯禄司铎斐默、李杕司铎问渔、沈容斋司铎则宽、马良司铎相伯、北京英华先生敛之等，他们的研究被认为是“基本都停留在旧籍之整理及史料的编纂上，还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¹。但近代历史学家陈垣在完成《吴渔山年谱》后，曾寄诗一首予方豪称：“教中柱石推朝士，墨井荒凉置道边，今日谱成聊举逸，发挥仍赖有豪贤。”注云“豪贤谓方司铎、徐卢伽。”方司铎即方豪，徐卢伽指徐宗泽。²陈垣把徐宗泽与著名教会历史学家方豪相提并论，可见其贡献之大。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在《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一书中对徐宗泽有这样一些评价，“徐宗泽是一位非常渊博的学者，他的著作包括哲学、伦理学、神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及历史学。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著作中很多是科学水平很高的著作，它们引用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成果。”“徐宗泽的神学著作与哲学著作对于民国时代公教的思想甚至对于神学术语有相当大的影响。他虽然还用古文或‘半古文’的表达方式，但他的思想是现代的，是跨越东、西、古、今的。”“至今，徐宗泽是一个还没有被发现的‘大师’。”³前人的诸多评论显示徐宗泽在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上有着比较突出贡献，但是关于他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学术界对于徐宗泽研究的不够深入可能存在以下一些原因：一、徐宗泽生前为人谦逊，关于他的生平资料非常少，现在学术界对他的了解大多仅限于天主教历史学家方豪所著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及《方豪六十自定稿》中的一些记录。二、徐宗泽的人生经历及其言论都很平实，没有太多的值得夸耀或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三、作为一名天主教神父，徐宗泽在担任《圣教杂志》主编期间，该杂志积极拥护罗马教皇各项通谕，以及各地教务的报导，虽然其中也有文化方面的评论文章，但总的看来事务性较强，这一点也阻碍了人们对他更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欲在收集徐宗泽相关的各种文献基础上，对他一生的活动和思想作一个比较全面的梳理，即他的生平，他的教会历史研究，他担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期间的活动，他主编的《圣教杂志》，他对教会教育、政治、社会等问题的看法等，通过叙述徐宗泽的活动及其思想，总结出他作为一个近代天主教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作为一个耶稣会士的文化关怀，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天主教本地化的关注和对社会问题的重视，以上是本文的基本结构。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坚持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历史的时代大背景中去，运用联系的、比较的、发展的方法来研究，在大量历史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归纳、

¹ 汤开建、陈文源：《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学报 2002 年 5 月。

² 同上。

³ [奥地利]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 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第 216 页。

综合，不做无根之谈，不乱下结论。由于与徐宗泽思想成长过程相关的日记或回忆性记录很少，所以我们不能从时间的纵向上来分析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只能从横向上通过整理他各方面的思想活动来理解他的思想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不能动态的、发展的认识徐宗泽，但是本文将尽量通过分析比较与他同时代的天主教知识分子们的成长特点来弥补这一缺陷。另外，徐宗泽谈论了不少宗教哲学思想，涉及早期西方宗教思想史的发展内容，而且引用了很多外文资料，这些相对于一直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我来说，由于知识面的限制，使得本文在对徐宗泽的宗教、哲学、社会等思想特点的分析上，存在不够深入的缺陷。对此我将较多阅读相关西方宗教思想史著作，同时请教对此内容研究较多的老师学者的意见，希望能尽量客观、准确的展开研究。这就是我为对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解决而提出的方案。

第一章 徐宗泽的生平

徐宗泽字润农，教名若瑟，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光绪十二年（1886）生于青浦县之蟠龙。其先世为避倭乱自上海迁居于青浦县之蟠龙，自十二世祖徐光启开始，徐氏家族日益成为上海县一带的望族，其后人多从政为官。虽然徐光启作为明末著名的耶稣会信徒在中国天主教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把天主教引入其家乡上海，实现了上海的“开教”，可能是由于“礼仪之争”等事件后清政府实行禁教政策的影响，清朝时徐光启家族没有人信奉天主教为神父。直到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会再次来华，徐光启的第十一世孙徐允希亦即徐宗泽的叔叔才接受天主教信仰并成为神父，¹徐允希1893年23岁时入耶稣会，后晋升为司铎，曾执教震旦，主编《汇报》，主持藏书楼，任全国祈祷宗会总指挥。徐宗泽的长兄宗德，字乃济，号养田，又号颂恩，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新科优贡，著有《宪政浅解》、《宪政俚言》、《地方自治俚言》等，民国初年任众议员。二兄宗贤，太学生，保举五品衔，也曾在《圣教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胞姊一为拯亡会修女；胞侄懋禄亦晋司铎。²

除了家族长期以来的信仰传统影响外，其周围很多与他有相同背景人的影响也是徐宗泽后来从事中国天主教事业的重要原因。在查看《圣教杂志》主要编创人员生平时，我们发现他们中很多人来自江苏，有些甚至与徐宗泽一样自来青浦，如该杂志前任主编潘谷声（1867-1921）即来自江苏青浦，后迁居上海董家渡，祖籍青浦的著名天主教信徒还有：马相伯的舅侄朱志尧（1863-1955），他是近代上海的实业家，曾担任上海公教进行会副会长。朱志尧的胞弟朱开敏（1868-1960）在1925年与另5位国籍司铎在教宗特使刚恒毅的陪同下，赴罗马接受教宗庇护十一世祝圣为主教，成为第一批国籍主教。³曾被教会历史学家史式徽称为“上海最年长的天主教士”的沈锦标（1845-1929），亦自来江苏青浦。⁴还有一些编辑来自与青浦很接近的南汇、松江等地，这一奇特现象与外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周边地区传教较多的政策有关，江南传教事业发达，产生了很多华籍神父，他们人生经历都较相似，早年大都接受过一些儒学教育，后来到上海徐家汇接受耶稣会系统训练，有些成绩突出的学生几年后出国留学升为神父，归国后在徐家汇一带从事传教工作。这些年轻的优秀神父们成为近代中国天主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载，徐宗泽在进入徐汇公学⁵学习之前，

¹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第203-210页。

²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中华书局1988年，第323页。

³ 《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主徒会编印，1992年，第136-141页。又见《朱主教开敏事略》（台）《恒毅》月刊第2卷第4期，第111页。

⁴ 孙金富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00-707页。

⁵ 徐汇公学是近代耶稣会在华创办的第一所有影响的学院，教内外学生兼收。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

他一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19岁时还去参加童子试为邑庠生，虽然家族有长期的信教传统，但在晚清社会要想让孩子通过接受教育将来进入上层社会，只得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这条途径才能实现，而科举考试对于信教者也没有过多限制，这就是近代很多天主教知识分子早年都接受过一些儒家教育的重要原因。徐宗泽的两位兄长，长兄宗德和二兄宗贤都参加了清末科考并获得了一定的头衔。但时事弄人，徐宗泽19岁那年参加考试正好是1905年即清政府取消科举考试的年代，随着科考制的废除徐宗泽仿效兄长入仕的道路也被封死。徐宗泽当时是否因失去走仕途之路的机会而沮丧万分，他是否受到家人的建议或帮助去徐家汇接受神学教育，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在他去徐家汇之前，其叔徐允希在徐家汇为神父，并担任《汇报》的主编，在公教界享有较高威望，相信这些都为徐宗泽进入徐家汇及将来从事《圣教杂志》主编都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从接受传统教育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到选择进入徐汇公学走神学道路，这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如果说徐宗泽在19岁以前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四书五经的教育，那么19岁后他所接受的却是西方天主教思想，这次中西文化间的大跳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西文化在与徐宗泽有类似经历的天主教知识分子身上所刻下的烙印也是深刻而明显的。

徐宗泽参加完童子试后很快进入徐汇公学，光绪三十二年（1907）徐宗泽入耶稣会初学院，两年后毕业，奉命赴欧美深造，他的出国生涯到民国十年（1921）结束，获得哲学及科学博士学位，并晋升司铎。留学期间曾两度回国，在徐汇公学任教两年，这样算来他在外国待了9-10年时间，即1909年至1921年，当时的世界形势是这样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德国、日本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实力不断超过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重新分割世界资源，1914年到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即苏维埃政权成立。当时欧洲各种社会问题严重，如劳工问题、妇女问题等，也存在很多社会流派。相信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徐宗泽在留洋的日子里除学习神学、哲学外，对西学流行的很多社会学理论都比较了解，这一点从他以后的社会问题评论性文章中可以看出。近十年的出国深造机会拓宽了他的知识面，使他看待问题的视野更宽、出发点更高。

回国后，徐宗泽在南汇县境实习传教工作，两年后即1923年回到徐家汇，直到1947年逝世，这段时间是他从事天主教传播事业的重要时期。1923年《圣教杂志》的主编潘秋麓神父谷声去世后徐宗泽接任其位，直到抗战爆发后1939年杂志被迫停刊，徐神父在《圣教杂志》上发表有关神学、哲学及教史文章，结集成书，在土山湾印书馆出版达二十余种之多，这些书籍有：《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1926年撰）、《妇女问题》（1926年编）、《共产主义驳论》（1926年编著）、

《探原课本》(1927年编)、《社会主义鸟瞰》(1928年编)、《社会问题》(1928年编)、《哲学史纲》(1928年编)、《心理学概论》(1930年撰)、《天主造物论·四末论》(1930)、《圣宠论》(1930)、《信望爱三德论》(1931)、《圣事论》(1931)、《妇女问题杂评》(1931年编)、《天主降生救赎论》(1932)、《教育原理》(1934)、《徐文定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1934)、《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8,上海书店重印于1990)、《伦理答疑》(1939)、《天主教之战争观》(1939)、《宗教研究概论》(1939)、《高中教理课程答解》(1940)、《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9)¹, 这些书大都为宗教神学著作, 用来作为当时教会学校的课外读物, 还有一些天主教关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著作, 及一些有关明清耶稣会士传教史的书籍。此外, 徐宗泽还一直担任徐家汇藏书楼²主任, 期间还积极收集全国各地方志, 1957年出版油印徐家汇藏书楼所藏地方志目录初稿统计有二千七百三十二种藏。我国收藏方志, 清末民初时徐家汇藏书楼居首位, 只是到了后来国立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等地才赶超上来。此外徐宗泽还负责指导启明女中及徐汇女中等校务, 教授教理、公民等课, 又任圣母会指导司铎。抗战胜利后, 徐宗泽最大的愿望有: 一为将藏书楼改为现代化图书馆, 公诸社会; 二为恢复《圣教杂志》, 均未获得教会支持。1947年5月1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天主教出版会议, 徐宗泽亦未应邀参加。6月20日, 因斑疹伤寒逝世。³7月10日, 上海天主教进行会等三十多个团体, 在徐家汇天主堂为徐宗泽神父举行大礼追思弥撒, 市政府及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方益书局、申报馆、新闻报馆、鸿英图书馆等都派有代表来参加。7月20日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在南京太平巷举行追悼, 南京《益世报》出版追悼特刊。还有不少公教界人士追怀徐宗泽神父一生的业绩, 生前好友、著名女文学家苏雪林(1897-?)称其为“唯一的神师”, “第二慈父”, 葉恭绰先生的一联, 更是赞扬了对徐宗泽神父一生对中国公教界的重要影响, “前规式廓, 车轸方道, 谁与共谈天禄阁? 气类渐孤, 典型空在, 不堪重过土山湾!”⁴

如果要对徐宗泽的一生做一个阶段划分的话, 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1886-1905)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时期, (1906-1921)年接受耶稣会系统神学教育时期, (1921-1947)年从事天主教文化传播工作时期。从徐家泽的一生, 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东西方文化都非常了解的人, 也是一个知识非常渊博的天主教信徒。由于他的很多著作都是回国后所著, 所以他在《圣教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是他作为一名神父后思想已经成熟时期的反映, 并不能让大家很清楚地了解他的思想成长过程。

¹ [奥地利]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 1900-1950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 第212页。

² 徐家汇藏书楼是耶稣会于1847年在徐家汇兴建的一座藏书楼。

³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中华书局1988年, 第325页。

⁴ 《上智编译馆馆刊》第二卷第六期, 第518页。

第二章 徐宗泽与《圣教杂志》

徐宗泽一生的传教事业与《圣教杂志》都是密不可分的，在担任主编的 14 年时间里，该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大量文章，成为他开展天主教工作、进行天主教文化研究的重要舞台。同时，《圣教杂志》作为近代上海耶稣会创办的一份全国性机关刊物，不仅发行范围广而且影响大。了解该杂志的创办情况及徐宗泽担任主编期间杂志的变化，有利于我们把徐宗泽放入近代天主教事业的大环境中，从而更好的理解他作为一个天主教办报人的办报思想，及他面对各种社会变迁所表现出的强烈时代性。

《圣教杂志》由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士于 1912 年 1 月 1 日创办，其前身为《益闻录》、《汇报》。《益闻录》是上海天主教最早问世的报纸，也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第一张报纸，于 1879 年由耶稣会中国神父李问渔¹创办，后于 1898 年与上海天主教人士朱志尧和另一朱姓教徒创办的《格致新报》合并改称为《格致益闻汇报》，1907 年又更名为《时事科学汇报》，次年简称为《汇报》。²辛亥革命后，《汇报》停刊，取而代之的就是《圣教杂志》。相对于其前身，《圣教杂志》的宗教色彩明显增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信徒数量大增，据统计 1900 年全国天主教信徒 74 万多人，1907 年增至约 90 万，1910 年约为 136 万，1918 年约为 196 万人，³编辑们可以不必过多考虑非教徒们的反应。另一方面中华民国建立，所通过的《临时约法》实行“人民有信教之自由”的政策，这一点使很多在华外国教会认为是传播宗教信仰的契机到了。而徐家汇耶稣会在民国初创办《圣教杂志》这一举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当时上海天主教的刊物还有《圣心报》，它是由祈祷宗会创办，在 1887 年问世到解放初停刊，长达 63 年，是上海天主教内历史最长的刊物。此外，还有《益世报》，它在上海发行量非常广，但该报不是上海天主教会主办的，它是由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于 1915 年 10 月在天津创办的，1946 年 6 月 15 日《益世报》上海版发行，不过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该报就停办了。与《圣心报》、《益世报》比较起来，《圣教杂志》作为上海耶稣会的机关报，体现了 20 世纪上半叶天主教耶稣会事业在华发展的特点。因为上海徐家汇的天主教事业是由法国耶稣会一手建立起来，它在大小文化机构都带有明显的法国色彩，⁴所以通过《圣教杂志》

¹李问渔（1840-1911），江苏南汇（今属上海浦东）人，1862 年入耶稣会，1869 年晋升神父。

²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705 页。

³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第 416 页，第 428 页，第 429 页，第 436 页。

⁴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见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我们能了解法国耶稣会在华的发展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1938年上海沦陷,《圣教杂志》所处的徐家汇地区又在租界之外,于是被迫停刊,所以《圣教杂志》的真正历史只有1912年到1938年27年时间。

担任《圣教杂志》主编一职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天主教人士:该杂志的创刊人为耶稣会中国神父潘谷声(1867-1921年)¹,潘谷声任主编直至1921年底去世,1922年由法国神父孔明道任主编,中国神父张百禄、杨维时任副主编,1923年改由杨维时任主编,中国神父徐宗泽任副主编,1924年徐宗泽接任主编直到1938年8月停刊。由此可见,《圣教杂志》前后经历的两任任期时间最长的主编就是潘谷声和徐宗泽,而徐宗泽担任了近14年的主编,是历任主编中任期时间最长的。该杂志其它编创人员主要是上海耶稣会培养的中国神父,也不乏一些外国神父与教区神父的参与,如惠主教、成主教、丁宗杰、陆徵祥等,也还有一些当时的社会活动家,如马相伯、竺可桢、潘光旦等,虽然他们不是杂志的主体人员,但他们的参与无形中增加了杂志的丰富性。从编创人员的组成情况来看,《圣教杂志》是一份主要由中国神职人员组织创办的教会杂志。²

作为上海耶稣会的机关刊物,而且还处于上海这样一个驻扎有各国宗教教派的国际大都市,《圣教杂志》创办质量较高,在全国公教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尽管《圣教杂志》应民国建立这一中国新形势而创办,而且编创人员主要由中国神职人员组成,但我们仍不能忘记当时中国天主教会仍掌握于外国教会手中这一事实,《圣教杂志》亦不例外,有一个史实为证,即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天津的爱国教徒发起了一些爱国活动,《圣教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公教友之热心救国》³的文章,支持天津教友的爱国行为。但当教务巡阅使光若翰到达上海后,教会立场就发生了变化,他指示《圣教杂志》发表“特别声明”,强调“教会中立”,重申反对罢工和学潮的立场,申明教徒“如果违反,应得神罚处分”。⁴我们由此可知,当时外国教会势力对中国信徒的爱国行为的压制和控制之严,而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他们言论的谨小慎微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工作环境下,徐宗泽开始了他一生的天主教传教事业。我们

¹ 潘谷声(1867-1921),字秋麓,洗名若翰保第斯大,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后迁居上海董家渡。自幼聪颖,号称“神童”。12岁就学徐汇公学。清光绪十年(1884年)入修道院,攻读神哲学。5年后入耶稣会,光绪二十四岁晋升神父。曾任徐汇公学校长、震旦大学副校长。清宣统三年(1911年),接任《圣心报》主编。

² 在《圣教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主要有以下一些教会人士:丁宗杰(教区神父)、赵石经、沈造新、沈公布、沈建成、沈良能、沈曾安、沈钦造、沈锡元、沈才俊、沈则宽、朱者赤、朱佐豪、吴应枫、王昌祉、花友兰、卫青心、丁义华、李书华、黎正甫、毛步欧、毛维新、俞伯禄、周清良、杨堤安庆教区修士、方豪、萧公权、华封老人(马相伯)、灵芬女士、秉直、惠济良、成主教、李杖(李问渔)、陆徵竺、可桢、潘光旦,还有许多文章的作者用教名来署名,如露谷、磐石、龛溪、若瑟、秉直、止之、躬耕子等,因为教名存在相同的可能性,而这些教名对应的真实人名,我们现在也无从考证。

³ 《公教友之热心救国》,《圣教杂志》1913年。

⁴ 《圣教杂志》1919年11月。

先来了解一下徐宗泽任主编后,《圣教杂志》在创办宗旨、内容编排方面有哪些变化。

该杂志创办之前,出有样本,分送各界,现将其发刊词大部分内部摘录如下:

- 甲简章: 一、本报定名圣教杂志专登教中信道学说事实凡不涉教事者概不采入。
二、每月一期与圣心报同时出版每期暂定十六张俟销数较旺再为扩充。
三、本报每年十二期暂定大洋二角邮费由中国邮局寄者外加一角二分由外国邮局寄者加二角四分如兼订圣心报者邮费暂免
- 乙目次: 一谕旨 凡教皇上谕及罗马各圣部文牒择要译登;
二论说 本馆记者自著俱系教友社会有关系之文;
三近事 凡各国教中大事及新闻等俱入此类;
四辨道 凡近人谬说与信道及哲学背驰者俱根据大道尽力驳斥以挽狂澜;
五考据 凡关于圣教掌故如圣经圣道礼节经文等俱源穷委以饷同志;
六答问 凡问道及疑难之端为之解惑析疑;
七杂著 凡中西名人演说传记文牒等与教务有关者或译或编列入此门;
八介绍 凡有教中圣书新刊之本为之批评以贡献于编者。¹

由以上内容可知,该杂志创办时确定的目标就是要以刊登与天主教有关的通谕、新闻、论述等文章为目标,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而且要记录各国教中大事,让信徒了解世界公教发展形势。该杂志有较多论述性文章,较少记叙、散文等文体,针对的是知识水平较高的读者,非一般的平民信徒。以上这些创刊宗旨贯穿《圣教杂志》27年创办历史,那么徐宗泽担任编辑后,该杂志内容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徐宗泽担任主编后,关于杂志的编辑情况曾先后发表过这样一些社论性文章:《第十四年之圣教杂志》:“一、改用新式标点,以分析词意;二、卷首登一短篇社论,以饷阅者;三、近事用小字排印,以便多载;四、辟通讯一栏,以交换意见;五、中外大事表,易以稍有系统之时事记述,似更有趣味。……”²《圣教杂志之主张》一文强调天主教应该注重教会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天主教的传入历史;新时代有很多新问题,其中社会问题最为突出等,这些都将成为杂志内容的目标。1928年开设“新时代评论”一栏,针对社会上新出现的很多社会、道德、政治等问题以短篇的形式进行讨论。³《本社之怀抱》一文强调除拥护天主教会、刊载教义外,还积极报道支持公教组织活动的开展,如中华公教信友进行会,中华公教育年会等,尤其当注意的是神父的培养,国籍男女修会的创设。⁴1931年该杂志创办20周年时,主编再次强调对于一些新思潮也应给以关注。1934年底,该杂志开设“信箱”、“随笔”栏目,针对读者来信及社会现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

¹ 徐宗泽:《二十五周年之圣教杂志》,《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

² 徐宗泽:《第十四年之圣教杂志》,《圣教杂志》1925年第1期。

³ 徐宗泽:《圣教杂志之主张》,《圣教杂志》1928年第1期。

⁴ 徐宗泽:《本社之怀抱》,《圣教杂志》1930年第1期。

行回答，注重与读者的交流和沟通。由于白话文浅显易懂，比较受欢迎，所以对于一些白话文稿也采用。以上这些变化，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个统计表来有更深入的认识。

本表把《圣教杂志》的整个创办时期分为两部分，因为潘谷声主编于1921年底去世，在1922年到1923年期间有其他神父代理过主编一职，直到1924年徐宗泽才成为正式主编，所以我以1923年12月为界，把《圣教杂志》分为两个时期，即以潘秋麓主编为主的时期和徐宗泽主编的时期。再根据徐宗泽主编于1936年所做的《二十五年圣教杂志分类索引》一文，对该杂志近30个类别的文章数量进行一个粗略的统计，通过这个统计使大家对于两任主编期间杂志内容上的一些变化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

《圣教杂志》内容结构一览表

类别	期别		1912、1-1923、12		1924、1-1938、8		徐宗泽发表文章篇数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篇数	百分比(%)
1、通牒	13	2.2	21	1.7	0	0	0	0
2、教理	16	2.6	58	4.7	37	11.8	37	11.8
3、经文	16	2.6	14	1.1	0	0	0	0
4、辩护	22	3.6	20	1.6	5	1.6	5	1.6
5、神业	5	0.8	4	0.3	1	0.3	1	0.3
6、宗教	13	2.2	72	5.8	32	10.3	32	10.3
7、孔教	26	4.3	0	0	0	0	0	0
8、教史	69	11.4	32	2.6	4	1.2	4	1.2
9、传记	184	30.6	124	10	6	2	6	2
10、教务	23	3.8	123	9.9	26	8.3	26	8.3
11、考据	41	6.7	73	5.9	7	2.2	7	2.2
12、公育	3	0.5	27	2.2	13	4.1	13	4.1
13、哲学	5	0.8	41	3.3	12	3.9	12	3.9
14、科学	3	0.6	11	0.9	0	0	0	0
15、公进	22	3.7	12	0.9	3	0.9	3	0.9
16、教育	24	3.9	82	6.6	27	8.7	27	8.7
17、政治	1	0.1	79	6.4	41	13.3	41	13.3
18、社会	37	6.2	35	2.9	19	6	19	6
19、论文	15	2.4	7	0.5	1	0.3	1	0.3
20、文化	0	0	33	2.8	8	2.6	8	2.6
21、妇女	0	0	72	5.9	2	0.6	2	0.6
22、文学	0	0	8	0.6	0	0	0	0
23、记事	11	1.9	19	1.5	0	0	0	0
24、小说	46	7.7	41	3.4	0	0	0	0
25、游记	0	0	20	1.6	11	3.5	11	3.5
26、文艺	0	0	42	3.5	0	0	0	0
27、随笔	0	0	26	2.1	26	8.3	26	8.3
28、信箱	0	0	27	2.2	26	8.3	26	8.3
29、掌故	0	0	64	5.2	5	1.6	5	1.6
30、杂录	8	1.4	48	3.9	1	0.3	1	0.3
合计	603	100	1235	100	313	100	313	100

根据《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的《二十五周年圣教杂志分类索引》

和各期目录统计与推算

通过以上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出徐宗泽任主编后，杂志新开了以下栏目如“文化”、“妇女”、“文学”、“游记”、“文艺”、“随笔”、“信箱”、“掌故”等，而且这些栏目文章的数量还占了较大的比重，这些文章文学色彩较强，使杂志内容

更加丰富易懂，注重与读者间的沟通，是一种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潘主编当年提到的“不涉教事者概不采入”说法的一个改变。徐宗泽任主编后，文章所占比重下降较大的有：“孔教”、“教史”、“传记”、“公进”、“社会”等。“孔教”主要是指袁世凯上台实行尊孔复古的文化政策，及1916年段祺瑞政府上台后提出“天坛草案”，草案第19条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体”。此举在宗教信仰自由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遭到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¹但公教界对此议题讨论时间并不长。关于“教史”、“传记”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天主教教会历史和天主教人物传记，它属于外国天主教史，潘秋麓任主编期间杂志发表了很多相关的连载文章。关于“公进”文章，民国成立后，天主教徒欲成立“中华公教进行会”，以此来发动和组织全国公教活动，具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性，1912年7月《圣教杂志》上发表他们拟写的《组织中华全体教友联合会宣言书》，他们即函请潘谷声主编“起草立会宗旨等简章”，²潘主编在1912年第8期上发表了他起草的《中华公教进行会简章》，进而《圣教杂志》成为中华公教进行会的通信机关，所以前期关于“公进”的文章会比较多，但后期也有很多相关报道，只是所占比重相对减少了。对于“社会”问题，因为1848年欧洲工人运动高涨，俄国、德国、法国等国工人运动较多，一战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社会主义理论在全球的影响，所以对于社会党的问题谈论较多，但徐宗泽主编期间也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数量上只是相对的减少了。

徐宗泽主编期间，杂志上发表文章所占比重增加的有：“宗教”、“教务”、“公育”、“教育”、“政治”等。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人们民族情绪的日益高涨，1922至1927年发生了非基督教运动，在华外国教会面临了来自文化界、教育界、政治界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所以关于“宗教”、“教育”、“政治”方面的文章比较多，1926年6月还出版了“教育专号”。另一方面，外国在华教会也积极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如何用公教思想培养青年信徒使他们形成公教人生观，便成为公教青年会开展活动的目标。罗马教廷也开始重视和推动本土神职人员的培养工作，1922年2月第一任驻华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这一事件是中国公教史上的大事，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运动。《圣教杂志》对于刚恒毅从1922年2月来华到1933年2月因病返意大利这十一年间在华的一系列重大活动都进行了报道。1924年5月至6月，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一次主教会议在上海召开，对于这一中国公教史上的重要会议，《圣教杂志》于同年的第7期出了“公教会议专号”，详细刊载了会议讨论的各项内容和大会通过的决议。1926年9月，刚恒毅携同五名中国传教士赴罗马参加祝圣大典，对此新闻该杂志也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当时祝圣时的照片。1929年7月出版了“全国教务统计专号”，资

¹ 查时杰：《民国基督教会史（三）非基督教运动与本色化运动时期》，《台大历史系学报》第10、11期合刊抽印本，第388-401页。

² 成和德：《中华公教进行会之演变史》，《圣教杂志》1935年第12期。

料由当时全国主教神职班提供,包括全国主教及监牧表,全国传教司铎及修士表,全国修院修士表,慈善事业表等。在这种情况下,“公青”、“教务”的内容大大增加了。这些变化显示了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运动迅速开展。

而从徐宗泽所著述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教理”、“宗教”、“教务”、“教育”、“政治”和“社会”。“教理”方面,徐宗泽写了很多关于“宠爱论”的灵修文章;“宗教”方面,徐宗泽关于宗教的起源、宗教的定义、人类的宗教信仰、宗教学研究等方面的论述;“教务”方面,主要是指徐宗泽自1925年开始在每期开头发表的编者言,主要是关于教徒培养方面和教务发展方面的言论。至于“教育”、“政治”、“社会”,本文会在接下来的部分中集中论述。同时通过统计我们会注意到,徐宗泽所发表文章的篇数占杂志总篇数的百分之十七,而且徐宗泽的很多文章都较长,他的一篇《社会主义的鸟瞰》就长达一万三千多字,所以从字数版面上看徐主编的文章绝对不止百分之十七,作为一个主编,他所发表的文章数量为何如此之多?方豪曾有一篇《我怀念徐润农神父》的文章,文中他这样写道:“他的著作环境实在太坏了!差不多外国教士,能著作的,都没有杂务;中国神父就不然;即以徐神父而言,他在最忙的时候,曾身兼六职,而且都是极琐碎的事务,叫他怎么能细心研究?可是杂志的篇幅不能不填满,书籍也真缺乏,不能不应急需,于是乎一切笔记、札记都编译成书。”²此言似乎道出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其实天主教会并非不注重创办在华中文杂志,徐家汇耶稣会早期培养的马相伯、马建忠、李问渔等这些优秀的中国天主教士,其最初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从事中文杂志的创办。³1936年中国公教界各种重要报纸及杂志参加《罗马观察报》创刊七十五周年纪念报纸展览会,1947年5月16日第一次全国公教出版会议在上海举行。尽管天主教也很重视文化活动,但由于外国教会的控制和思想上的相对封闭使天主教会的文化事业发展并不如基督新教那般活跃。对于公教报刊存在的问题,《圣心报》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第一,太轻便了。出版的东西,除了一二种中型刊物,若圣教杂志,我存杂志,新北辰……之外,大概都是薄薄的小小的几张,几口气就能念完。第二,是太陈旧。社论大概缺少时间性,新闻更不论,可说都是些新故事,宠光社的新闻转辗登载,未免过于重复。第三,是太干涩,一切文字,大概用在谈论道学,绝对没有兴趣两个字介乎其间。第四,有几种杂志,编者人数太少,内容自难丰富,编者虽然有时会换上几个笔名,但看看文字笔法,就可以看出只有他一人在牵线;试想一人的精力有限,如此一月二月

¹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41-153页。

²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573页。

³ 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71页。

尚可安度，但一年二年之后，自然脑汁绞尽而刊物陷于停顿，即幸而不停顿，也难弄出好东西。”¹此言道出了公教报刊界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而文中所谈到的第四种情况似乎就是在说《圣教杂志》主编徐宗泽一人撰写很多文章的现象。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外国教会控制下的公教思想言论封闭保守，这直接导致杂志的读者少，销量不广，进而影响杂志创办资金的缺乏，使稿件质量下降。

尽管近代公教报刊业不是很景气，工作环境恶劣，但一直坚守在文化出版岗位的仍然是那些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们，徐宗泽便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长期的文化工作使他对于教会报刊界存在的问题，及该如何办报等问题更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曾发表《对于公教报纸的感想》一文，他认为：一、报纸上论文的范围应广，不应受诸多社会政治因素的拘束。很多人认为公教报纸在言论上要有公教精神、公教思想，因而对于外教异教所常用的论调，所讨论的资料都不采用，这样只会导致论文的范围非常狭隘，徐宗泽认为如果编者能用公教的眼光评论，任何事都可以纳入讨论范围之列。二、公教报纸当起到引导思潮的作用，对于一切学说主义，应给公众示以当遵循之准绳。如当时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读书竞争会”、“新生活运动”等，又如国民党北伐时，革民党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公教中的言论有赞成三民主义者，有不赞成者，有分别取舍者，还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新文化运动、非宗教同盟、无神论、唯物主义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公教报纸讨论的对象。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两种方法，即消极法和积极法，消极法就是从天主教角度进行辩驳，指出对方的错误，积极法就是阐明天主教的教义或道理，告诉人们应该选择的正确处理方法。²这些理论显示了徐宗泽对于社会世俗问题的关心和参与意识，对于来自外界的各种挑战不是消极的逃避或一味攻击，而是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从天主教角度提出一些积极的回应方法，这种较为客观的态度和平稳的处理方式，与近代中国整个天主教会给人于世隔绝的感觉不太一致，也是徐宗泽这些天主教知识分子们希望改变当时天主教会比较少关注社会问题的一种努力。

至于公教报纸上的论文，徐宗泽认为：第一要稳妥，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主义、新的宣传、新的运动，在未曾成熟之前，未曾认识其目的和它所用之方法之前，不当随声附和。公教报纸不尚新颖，不做先锋，要在求稳妥中成为时代的领导者。第二要负责，报纸作为一个言论宣传机构，其责任重大。公教报纸的负责人其最大的职任是关于信德道理，风化伦常，及言论的适宜问题，其次办报者不要怕，切实去负责，不卑不亢，有包容心。第三要有主张，凡报纸领袖社会思想的资格的，必有他的主张，且其主张必健全，必超越，必切实际，能引起人们的

¹ 陈秋莹：《因圣心报征文引起的一点小感想》，《圣心报》1937年1月1日。

² 徐宗泽：《对于公教报纸的感想》，《圣教杂志》1936年2月。

信仰，足以指导时代之思潮，为真正的主张。因此公教报纸不当奴于成见，偏于感情，审事度理，要以基督的精神为精神。第四要提高思想，公教中虽有不少知识阶级，但总体来看，读书识字还没有得到普及，故教友的知识程度不甚高，公教报纸的论文所以要有充实的思想，丰富的知识来提高信徒们的文化水平。¹稳妥、要负责、要有主张、要提高思想这四点徐宗泽对于文章的具体要求，可见他作为一个办报人对于如何办报及文章的思想性等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这些都是他从事《圣教杂志》十多年主编工作得出的经验。

《圣教杂志》是徐宗泽一生热心经营的文化事业，1938年日军从金山卫登陆上海，该杂志所在地处于租界之外而被迫停刊，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宗泽有一个愿望就是恢复《圣教杂志》，但没有得到教会支持。²据历史学者方豪回忆，1947年5月17日在上海举行中国天主教出版会议，当时方豪向高乐康神父（比利时人）、黎培黎公使提出让徐宗泽参加的想法，并去函让徐神父做准备及询问他对于会议的意见，结果徐宗泽回信说“希望公教书籍在文字上多加注意，不要出些不中不西，不文不白的书。”同时他囑方豪在会议上在这一点上多说话，最终徐宗泽也没有得到邀请去参加。³徐宗泽神父去世后，各大新闻出版界纷纷派代表出席他的追悼会，这些都是对徐宗泽一生在公教出版业所作卓越贡献的最好肯定。

¹ 徐宗泽：《对于公教报纸的感想》，《圣教杂志》1936年2月。

²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中华书局1988年，第323页。

³ 《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572页。又见李东华著：《方豪先生年谱》国史馆印行2001年，第63页。

第三章 作为历史学家的徐宗泽

徐宗泽从事的众多文化研究工作中,对公教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学者们在研究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活动及近代天主教的传播情况时,都会引用徐宗泽所编撰的两部重要天主教历史著作,即《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借助去欧洲留学接受神学哲学训练和长期从事徐家汇藏书楼的管理工作等机会,徐宗泽能接触到比较多的原始文献,这就使他的著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奠定他是中国较早开始研究天主教史的历史学家的地位。

一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该书由徐宗泽编著,在1938年底由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其内容在《圣教杂志》第二十五、二十六卷中已刊登过。1990年10月,复旦大学、上海书店为保存史料、抢救文献,决定从民国时期出版的约10万种图书中选择数千种辑为《民国丛书》。徐宗泽的两部教会史著作:《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都列入其中。《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是一本通论性质的宗教史书籍,全书共分十一章:“开封犹太教”、“唐景教碑出土史略”、“唐景教论”、“元代之聶斯脱里异教”、“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史略”、“明末天主教之传入中国”、“中国天主教——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中国天主教史——自清入关至康熙朝”、“雍乾嘉道时之天主教”、“中国圣教史——自鸦片战争至今日”、“中国圣教掌故拾零”。从其目录我们可以看出徐宗泽注重对天主教早期历史的研究。

在阅读该书时,我们会发现徐宗泽治学非常严谨,博采众长,注重史料的全面和准确。如在讲开封犹太教时,他引用的相关资料有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陈垣先生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在讲唐景教碑及唐景教史时,引用夏鸣雷司铎的《西安教碑》(法文版)、冯承钧的《景教碑》。其它一些主要参考书有:王治心编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德礼贤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萧若瑟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高宠磐的《江南传教史》,此外,作者还引用一些报刊上的资料如《圣教杂志》、《汇报》、《圣心报》、《禹贡杂志》等,其实徐宗泽在书中还引用了很多法文资料来进行佐证,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该书史料运用的丰富和详实也得到学界研究人士的认可,成为天主教史研究的必看书目,著名史家王治心在其通史著作《中国基督教史纲》一书中,对中国天主教研究也有相当的篇幅,“第12章‘礼仪问题的争端及影响’后半录自徐宗泽之《中国天主教传

教史概论》第9章。”¹其实在20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会就兴起了一股注重中国文化建设的潮流，²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充实和丰富了徐宗泽的著述。

该书除资料运用、叙述方法上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便是他的教会叙述史观。对于犹太教在中国的兴衰，徐宗泽认为：“呜呼犹太教寺犹太教碑，至今不过为考古家之冯吊而已，犹太人亦不自知其教义，盖一赐乐业教已失其宗教存在之性质。吾曰是不足为惜，盖犹太人所等待之默西亚既来斯世，而立定新教矣；即罗马公教。”³对于唐景教、元聶斯脱里教，徐宗泽从基督教正统教义角度出发认为它们是异教，“吾谓景教不必纪念；盖景教谓耶稣有二性二位：天主性，天主位，人性人位，圣母非天主之母亲，此异端道理也。此异端寄生于中国，不即消灭，为圣教之传扬不特是一阻碍，且为信德之一致，是一扰乱，景教之绝迹于中国，实天主上智之安排也。”⁴对于教案的发生原因，徐宗泽认为：“原教案之发生，由于双方之误会，彼此之隔膜，愚民无知，妄听谣言，而祸患起矣。”⁵“故教案者实为民教之不幸事件，而吾天主教固清洁自守，而不知已被人嫁祸而蒙其害矣。”⁶这些教会立场的言论出现在一本历史著作里，在当时的非教会学者看来是不可理解而且是非常错误的，引起当时学者的反感，所以1939年9月的《图书季刊》有一篇很不客气的评论，评论者认为：“其叙天主教之传播，则口口声声，曰天主上智之安排，曰圣徒在天祷祝之功效，纯属宣传之口吻，叙述史事者所忌也。结论数面，完全宣传，更可不必。”⁷这些表明徐宗泽是一种教会史观，是站在教会立场来进行叙述的，与当时兴起的一些关注教会史研究的学者，如陈垣、张星垠、冯承均、向达、方豪等的学术研究不同，作为徐家汇耶稣会培养起来的一代天主教知识分子，徐宗泽身上体现出较强的护教色彩，其思想比较保守，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与社会学界间进行沟通的阻碍。

对于明清耶稣会士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所形成的辉煌历史，徐宗泽是非常赞赏的。对于利玛窦徐光启的文化传教政策，徐宗泽认为，学问的作用“在人们的悟司上晓示以真理，于是欲司动而欲之；故其力量，和缓而固定”。“是从本性的学问，引人归到超性的学问”。⁸徐宗泽更多是从传教策略方面来赞赏明清耶稣会士们的“文化传教政策”，至于利玛窦与徐光启为加强中西文化间的融合

¹ 王治心撰，徐以骅导读：《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1页。

² “1913年，英敛之在北京宣静园创立‘辅仁社’，招收教中子弟研究国学，时马相伯、陈垣多与聚首，所拟习题有《太古同源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贤著述辩》等，开天主教在华史研究之先声。1925年，教宗庇护十一世允许建立辅仁大学以后，天主教传华史在陈垣、张星垠、冯承均、向达、方豪、徐宗泽、罗光等教中及学界前辈的倡导下，有了长足的进展。”顾卫民：《50年来中国大陆有关基督教传华历史的研究》，《当代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

³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1990年版，第16页。

⁴ 同上，第109页。

⁵ 同上，第277页。

⁶ 同上，第279页。

⁷ 《图书季刊》1939年9月，第305页。

⁸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1990年版，第328页。

所做的努力，并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在分析中西交通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时，谈到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传统的敬孔祭祖之事看法的分歧，徐宗泽认为利玛窦之所以允许中国教徒们参加祭祖，同意考生考中后入孔庙行礼，“原利子之所以许可者，亦不过从权，暂时之处置而已。”¹而事实上利玛窦所实行的文化传教政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理解，是真正适合当时中国实情的传教政策，与当时多明我会传教士反对祭祖敬孔的做法不同，利玛窦努力在中西文化间找到一种调和，而这种方法也绝非权宜之计。²作为教会史研究者，徐宗泽看到了利玛窦所创传教方法的成功之处，但当时教廷关于“礼仪之争”尚未解禁，徐宗泽只能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对这一事件做出解释，这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宗教徒的矛盾。

二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

作为耶稣会士，徐宗泽对于明清耶稣会士著作的收集工作非常积极。“或为中文著作，或为当年之木版本，或为手抄本，或为自世界各大图书馆影得之珍本，如土山湾排印本徐氏庖言，及交商务印书馆印行之名理探十卷本，皆为徐宗泽所得珍本。”³而《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是徐宗泽于1940年为纪念耶稣会创立四百年而编著的，194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共十卷，卷一为绪言，对“明末耶稣会士输入之科学”、“西士所著书之分类”、“罗明坚之天主圣教实录”、“利玛窦之天学实义”、“西士所著书影响于中国整个学术”、“西士输入科学方法之影响”、“西士所著之宗教书”、“西士与华士著译书籍”、“西士所编译书之文理”、“华儒润色西士之书籍”等十个问题进行了简要论述，作者认为明清时期从西方传入的很多关于天文学、地理学、火器学等方面的书籍对中国整个学术都有影响，使人们开始注重以科学之方法研究学问，所讨论的问题皆为切实有用之学。关于书籍的翻译，作者讲述了西士与华士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翻译西书的过程，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润色外来书籍努力使译文符合原著精神的情况。

从第二卷至第八卷，作者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分为圣书、真教、辩护、神哲学、教史、历、算、科学、格言等七类，在这七卷中作者摘录了各类书的序言，便于读者了解所录书的写作宗旨、内容简介，这七类书中关于“圣书”、“真教”、“辩护”这三类书的序言内容比较多，其它四类相对较少，在“科学类”中录有艾儒略、杨廷筠、东海许胥臣为《西学凡》所作一些言论，这些都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作者收录的这七类书的序言是该书的主体。

第九卷为译著者传略，收录了从明清开始70位左右来华的外国译者，这些

¹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1990年版，第232页。

²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3-236页。

³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第323页。

略传包括作者的中外文名字,生卒处月,国籍,在华生华经历,所译著书籍,及这些书籍的出版时间地点等,内容较为详细,这些是徐宗泽从费赖之司铎所著之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fur les jesuites ets* 书中摘编各译著者之传略而成。¹近代研究明清耶稣会士资料的丰富在客观上也便利了徐宗泽的编著工作。

第十卷为徐汇巴黎梵蒂冈图书馆书目,它们是:“一、《徐汇书楼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共405种。徐家汇藏书楼的藏书是江南耶稣会重建之后,会士们刻意收集的,较多的是重刻本和照片翻拍本。二、《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收录较多,为731种。巴黎耶稣会省是本会重建后,负责向中国传教的会省,许多中国文献被集中到那里,因此还有不少中文著作,特别是一些早期的中文手稿和刻本,在明清时就被作为档案送到总会。三、《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收录罗马教廷图书馆的中文著作。收录时删除了重复书目,留下的是重要的文献和手稿书目,共169种。”²这些是徐宗泽神父利用在巴黎和罗马攻读神学博士的机会,又利用当徐家汇藏书楼馆长的条件统计出的三种书目。这些书目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徐宗泽是较早关注梵蒂冈汉籍文献的中国学者之一,具有较重要的开创意义。1927年4月25日徐宗泽致陈垣函称:“北平图书馆自袁先生回来后,亦曾寄下华蒂冈图书馆书目,惟查各书,敝处(指徐家汇藏书楼——引者)都有矣。”³对巴黎国立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重视比较早的有:王重民⁴、向达⁵、方豪等,他们都利用去梵蒂冈图书馆的机会,收集与中国历史相关文献。在国家动荡不安,很少人注重典籍收藏整理的年代,像徐宗泽这样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在收集明清耶稣会译著资料方面所做的这些努力,极大的便利了后人研究中国基督教传播历史及东西文化交流史。

对于这本书,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有的学者从著译图书的学科类型来分析西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情况,如1996年6月《四川图书馆学报》上发表的《从〈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看中西学术交流》一文。还有的学者从对明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角度来研究该书,如《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5月刊登的

¹ 法籍耶稣会士神父费赖之的《明清间在华耶稣会上列传》(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梅垂骥译,上海光启社,1997),是费赖之在江南传教二十余年,倾一生心血所作而成,研述了1773年前在华传教的四百余位耶稣会士的传记和书目,广泛引用了西文史料,随后有荣振华神父(亦近代入华耶稣会士)编了《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耿升译,中华书局,1995)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补充。引自陈开华:《二十世纪汉语界的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综述》,《中国天主教》,2004年3月。

² 李天纲:《简论明清“西学”中的神学和哲学》,《复旦学报》1999年3月。

³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23页,转引自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3月。

⁴ 王重民(1903-1975),字有三,河北高阳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图书馆工作,先后赴法德英等国家图书馆,1936年又赴意大利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搜集有关天主教资料。

⁵ 向达(1900-1966),字觉明,署名方向,湖南湘潭人。1935年赴英国,初在牛津大学图书馆任交换馆员;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博物馆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国文书。1937年夏,在柏林、巴黎等地博物馆、图书馆中,对流出国外之我国珍贵史料进行抄录和照相。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一文，作者宋巧燕得出这样一些结论：“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和我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还有学者这样分析该书，“这是唯一一本中国天主教文献目录学专著”。¹以上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通过分析该书，透视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情况，这一点可能是徐宗泽在编辑该书时也没有想到的。

三 徐光启研究

徐光启²是我国明清时著名的科学家，他与李之藻、杨廷筠被称为明清时中国天主教的“三砵石”。徐光启赞同和参与了利玛窦等人提倡的学术传教思想，他们和平、平等的传教方式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的一个高峰，明清耶稣会士不论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还是在天主教的传播方式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后人们研究的热点。徐氏家族自徐光启开始成为上海的望族，其后人多从事朝廷文职工作，到了徐光启第十一世孙徐允希即徐宗泽的叔叔，才开始为神父，徐光启第十二世孙徐宗泽后也为神父，徐宗泽胞侄徐懋禧亦为神父。也许是因为受家族先人的信教传统影响，也许是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知识分子的责任要求，近代徐光启的后人都非常关注徐光启的资料收集及其研究工作的开展。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李问渔神父杖编印徐文定公集四卷；三十四年（一九零八），文定公十一世孙允希编增订徐文定公集五卷，次年铅印问世。民国二十二年为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徐宗泽神父又增订一次。五十一年，值文定公诞生四百周年，徐神父胞侄懋禧在台北影印者即此本”。据历史学家方豪回忆，“民国二十八年，徐神父又作增订，曾将校样寄昆明托余覆校，余告以明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陈子龙刊行明经世文编内有徐文定公集，选有遗文三十三篇，可采用。但此一增订本，迄未发行。”³徐宗泽对于徐光启及李之藻等明清耶稣会士资料的收集真可谓尽心尽力，不厌其烦，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宗泽与马相伯、陈垣、方豪等的大量来往书信中体味一二。为了尽量减少徐光启文集编辑的错误，一方面近代学人努力寻找资料的原本，如1862年是徐光启诞生四百

¹ 陈开华：《二十世纪汉语界的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综述》，《中国天主教》，2004年3月。

²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谥文定，是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个上海天主教徒。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北京，他向利玛窦等学习欧洲近代科学，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又编译《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用以改善水利、屯田以及军器制造等。万历三十五年父丧扶柩回乡守制，邀郭居静来上海传教，次年，郭居静到上海开教。万历三十七年，在徐光启的影响下，上海已有新教徒200人。当时朝廷内一些官员要求请驱逐外国传教士，徐光启上《辨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认为天主教教义和西学科学知识，“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教正佛法”。还把官邸当作传教士庇护所。他长期从事农学研究，精心收集研究各地农业经验，著《农政全书》共10卷，曾列席天启七年在华耶稣会召开的“嘉定会议”讨论有关“天主”、“上帝”的译名等问题。后来升为礼部尚书，监督历局，起用西方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等推算历法，主持编纂《崇祯历法》，制造天文仪器。其一生主要著作有主编《崇祯历书》137卷（其中105卷亲自定稿）、《徐氏庖言》5卷等。

³ 方豪：《天主教人物传记》（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3页。

周年纪念，当时王重民正为上海中华书局重新编较《徐光启集》，希望恢复到明本文字之旧，所依据的材料中就有徐允希、徐宗泽所据家藏祖本，明钞本《徐文定公奏疏》三册，及徐宗泽在巴黎图书馆照来的明刻本影片《徐氏庖言》。¹另一方面学界人士间书信往来频繁，互通各人收集资料的情况，以求资料收集得更准确更全面，徐宗泽寄给陈垣的书信中曾谈到：“先生今春寄下之续订徐文定公集目录上，有卷三、五、六中数篇，为敝处所未有。如蒙托人抄录惠下，不胜感激。泽刻在续印文定公集，如蒙公准加上，尤为欣幸。”“徐文定公著有《毛诗六帖》，闻罗振玉先生抄有是书，不知仗先生鼎力能设法觅到否？”²总体来看，徐宗泽关于徐光启的编纂工作有：《增订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汇编》（土山湾印书馆 1934 年 4 月）、《影印徐氏庖言》，未刊稿有：《再增订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传》。除了对徐光启的思想进行整理外，徐宗泽还利用他作为《圣教杂志》主编的机会组织一些纪念活动来扩大徐光启的影响，唤起人们对这位明末伟大的教会人士的研究。

1933 年是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徐宗泽在《圣教杂志》上发表社论《开教肇庆建堂三百五十周奉教阁老去世三百周》，在 1933 年第 2 期上该杂志又刊登了陆公徵祥提议徐文定公列品之请求书，“受到国内外同道同志的赞许，同时南京教区主教惠济良也积极支持，议决由圣教杂志社会出一‘徐上海专刊’编印‘文定公徐上海传略’及出版由巴黎国立图书馆影印以归之‘徐氏庖言’，而陆徵祥提议将增订之徐文定集增补重印巾箱本。宗教典礼方面，议决于徐光启逝世日开一追祷大会，柬请中西政商学界参与典礼，惠济良主教发出中法文请柬。当日社会各界名流都有到场，上海各大杂志报刊对此事也都有报导，南京中国天文学会所出之《宇宙》杂志，及钟山书局出版的《国风半月刊》，天津《北辰杂志》均出专号，徐家汇汇师中学‘我们的教育’社亦特出《徐文定公三百周年纪念论文》”。³徐宗泽编著的《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文汇编》（圣教杂志社，1934）一书，包括了众多社会名流发表的文章，其中既有著名的教会人士张星曜、黄节、马相伯、徐景贤、张百禄等，也有竺可桢、向达、潘光旦等教外人士的参加。这次纪念会可谓意义重大，对于天主教会来说，徐光启是中国天主教史上贡献卓越的教士，陆徵祥等人向罗马教廷提出的关于给徐光启列品的请求，显示了近代中国教士们希望通过弘扬历史来提高中国天主教信徒在罗马教会中的地位，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是 20 世纪初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开展所取得成果的一个表现。

徐宗泽认为徐光启一生有三事业：“笃信公教，渡进科学，热心救国。”对于徐光启是否真正笃信公教这一点，一直以来“某些中国近现代学者对他皈依天主

¹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 314 页。

²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6 月，第 325-326 页。

³ 徐宗泽主编：《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汇编》绪言，土山湾印书馆 1934 年 4 月。

教的真诚性表示怀疑，国际上也有一些类似的看法”。¹更何况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学者们呢？黄节在《徐光启传》中曾这样写道：“盖阳尊其教，而阴取其象数之学，以为己用，彼教士之传其艺学，如其其慎，光启匪奉教，曷薪其传，则其对于教宗所以信服而图益者可见已。”²对此，徐宗泽作为编者认为：“此说未免诬光启，失实。”徐宗泽是站在教会立场来看待徐光启的宗教信仰的，认为他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所以不容许别人对徐光启信仰的任何怀疑。对于徐光启的“渡进科学，热心救国”，这两点是得到教内外人士一致赞同的，在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知识分子积极寻找各种救国理论的时代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吾人际此东北沦亡，国难日亟之秋，纪念此一有明一代之大人物，为中国近代文化上之先知者，应如何激励奋发，勉承先贤御侮抗暴，科学救国之英武精神，以发扬光大之耶。”³“我国虽由光启于三百年前提倡科学，但吾人试观今日之成绩，则实堪痛心。……至于应用方面，非但无重大之发明，抑且少精确之仿造。自国防利器，以至日常用品，无不仰给外国输入。而一般社会缺乏科学常识，尤非二十世纪所应有之现象。”⁴借古人的精神来激励近代国民的科学精神、爱国热情，这一目的在近代学者中也有很多响应者，如梁启超、胡适等。正如徐宗泽说所的，对于非天主教信徒来说，徐宗泽曾谈到：“当今教外学者中，有不少喜欢研究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入之科学，因而同情于公教者，不在少数。”⁵这说明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们也希望努力扩大公教在社会学者中的影响，来提高公教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

四 小结

以上分析了徐宗泽作为历史学家的三个比较突出的贡献，即编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收集整理徐光启资料，其实徐宗泽对中国天主教历史的研究不仅仅表现在这三个方面，他在《圣教杂志》上还发表了很多有关教会历史的长论，⁶总体而言，徐宗泽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坚持的是一种教会历史观，对于很多历史的叙述评价都是站在教会立场来进行的，这是徐宗泽著史的一大特点。希望通过弘扬明清耶稣会士们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天主教，欣赏天主教，进而信仰天主教，也是徐宗泽著史的目的所在。但是瑕不掩玉，徐宗泽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所做的大量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在近代也是很少见的，它们给现代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

¹ 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3 页。

² 徐宗泽主编：《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汇编》绪言，土山湾印书馆 1934 年 4 月。

³ 陈彬龢：《徐文定公三百周年纪念》，《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汇编》，土山湾印书馆 1934 年 4 月。

⁴ 李书华：《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纪念感言》，《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汇编》土山湾印书馆 1934 年 4 月。

⁵ 徐宗泽：《圣教杂志》1937 年，编者语。

⁶ 如《中国传教得力于学术之历史观》（1936、1）、《太平天国之宗教》（1936、5）、《明清之际中国整个学术思想之革新》（1937 年第 10 期，第 1938 年第 4、5 期）、《中国文化西浙之介绍者》（1938 年第 7 期）。

第四章 徐宗泽与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是耶稣会于1847年在徐家汇营建的一座藏书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主要贮藏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名贵西文书籍八万册。据1993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书目》的介绍,上海图书馆目前收藏的西文珍本书籍,相当一部分来自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下层专藏中文书籍,有徐宗泽神父从各地搜集而来的省府厅县志,有各省名贵碑帖等十二万册,志书二千一百余种以及各种古币等文物,据徐宗泽神父遗著《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所藏明清间教会书目》,可知该馆藏有明清以来耶稣会士和中国教徒所撰的教理和教史著作数百种,其中有《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三山论学记》、《圣经直解》、《主经体味》、《弥撒经典》、《主制群徵》、《主教缘起》、《超性学要》、《名理探》、《徐氏庖言》等名著。¹

徐宗泽自从留学归国回到徐家汇以后,便一直担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一职直到逝世。徐宗泽在担任馆长期间整理出《徐汇书楼所藏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及中国公教学者译著书目》,共405种,收录在《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一书后面。徐宗泽所列书目中很多珍贵的书籍在解放前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携至台湾的天主教图书,是以‘徐宗泽目录’所收为基础,配了藏书楼一些方志和其它善本而成。”²随着人们对教会史研究的日益重视,徐家汇藏书楼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开始被重视起来,而徐宗泽在担任馆长期间所整理出的书目为人们了解解放前藏书楼的藏书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徐宗泽担任馆长期间,一直希望把藏书楼对外开放,实行现代化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文化机构吸引更多学者对于公教文化研究的兴趣,但这一建议一直没有得到教会的采纳。教外人士想进去查资料都是被禁止的,但徐宗泽利于其职务之便私底下仍然支持一些学者去藏书楼查资料。上海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和古文献学家胡道静在回忆上海通志馆的创建经过时,曾谈到:当时上海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是徐家汇耶稣会修士院里的天主堂藏书楼。这所藏书楼在解放后归上海图书馆管了,但当时它是耶稣会修士院的图书馆,平时只有在修士院里做学问的修士、司铎才能进去,对外根本不开放。由于我知道那里有许多有关上海地方史的藏书、报纸,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天主教方面的关系,结果终于找到了。原来,馆长是位天主教的司铎,是中国人,姓徐名宗泽,教名Joseph,并根据教名的法文读音取了个字,叫若瑟,是明朝大科学家徐光启的后

¹ 顾卫民:《天主教东传与上海徐家汇地区》,澳门《文化杂志》2002年夏季。

² 李天纲:《徐家汇藏书楼与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9月,第529页。

代。因为我事行知道他是徐光启的后代，当时正在重编他祖生的集子《徐文定公集》，而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徐光启的科学名著《农政全书》用过一点功夫，于是一开始就与他谈徐光启的书，他很是高兴，一下子就变得投机了。我说，我晓得藏书楼里有许多有关徐光启的书，想进去看看。他说可以，但下不为例。我想，能进去一次摸摸情况总比关在墙门外好，于是就去了。在那里，我一下子看到许多上海的志书。当时，通志馆收藏的上海志书只有《同治上海县志》和《上海县续志》，而这里不仅有清代康熙年间的县志，清代嘉庆朝的县志，而且甚至还有明代万历时的县志。那么旧报纸放在哪里呢？突然，我看到摆放地方志的对角书架下堆着许多报纸。于是，我就对他讲，我对上海出版的报纸也很有兴趣，想来看看，特别是天主教办的报纸。这样一说果然有效，他高兴地同意了。于是，我从此就成了这家修士院图书馆的特殊读者。当时，修士院外面不远的地方有裁缝店，里面长年有几个裁缝在做衣裳。去修士院必须经过店旁的一扇门。平时，那扇门关着，只有当修士院里的人来了，店里的裁缝才会拨动机关把门打开。至于其他人，他再招呼，他们也不会睬你。由于我与徐宗泽的关系搞好了，徐宗泽就吩咐看门的裁缝，如果我去的话，可以放入。于是我每天都可以进去了。当时，修士院里的修士可以把书借回去看，而我只能坐在地上看。后来日子长了，修士就借给我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总算可以坐着看书了。回首当时，生活真是已变得神秘不堪。就这样，我断断续续约去了一年，主要是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后来，我与徐宗泽讲明我是通志馆的人。'这是一段简短的回忆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徐宗泽对于当时中国文化事业的积极支持。

徐宗泽在担任藏书楼馆长期间积极收集方志，《圣教杂志》上刊登过《收买志书通啟》：“逕啟者，敝处收集各省府厅州县志书，已得千数百部，惟所缺尚多，对于东三省、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省，尤属寥寥无几，各省诸位司铎及先生，如蒙代搜，不胜感激。若得此种志书，请将书名卷数册数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日及书价，开单见示，所缺志书单目，请检阅上年本志第三期。（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啟）”²关于民国方志的收集工作，其实在辛亥革命后就有一些学者开始注重方志在保存地方资料上的重要性及其教育功能。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由于政府的督促，全国各省普遍建立了修志局、馆，着手编修通志。³有了政府政策的支持，一向注重传统文化资料收集的耶稣会也积极收集地方志。

徐宗泽对于收集地方志的重要性是这样分析的，“传教于一地，当知一地的民风物产，政事教化，以及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居斯土而不知斯土的历史地

¹ 胡道静口述，袁燮铭整理注释，《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史林》2001年4月。

² 徐宗泽：《收买志书通啟》，《圣教杂志》1933年1月。

³ 胡道静口述，袁燮铭整理注释，《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史林》2001年4月。

理，是君子之所耻。”¹他认为传教士如果能了解地方上的风俗人情，那么就会既可以与上层的绅商讨论地方掌故，也可以与下层的农民谈耕种、乡村的物产等，这样可以拉近与地方人士间的关系，有利于传教。而且地方志中都开辟有宗教一栏，教士们应该注意收集整理教会资料，便于天主教的史事编入志书，“许多教会的事，一经载入县志，非特为将来，有历史的考据，为教会，有公文的保障”²。当然徐宗泽在注意到参与地方志的编撰与整理有利于传教之目的同时，也再次强调了公教会一向注重文化研究这一物色，“天主教是文化的宣传者；文化的使命，是传教士人人负之；文化的种类，当依时地之所需要而选择为之。我国的志书，是我国历史上的特殊书籍，有其特殊的价值，有研究的必要；而这研究的工作，又在传教士的手中，人人可以为之。”³

如今，几经翻修的徐家汇藏书楼已经不是昔日的模样，但走进藏书楼内部我们仍能透过保存阁楼书架领略其古朴、典雅的风韵，那些早已泛黄的中外典籍闪耀着先人的智慧和收藏者不懈的追求。

¹ 徐宗泽：《公教士当怎样注意中国地方志》，《圣教杂志》1933年8月。

² 同上。

³ 同上。

第五章 徐宗泽的宗教教育思想

徐宗泽的教育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教育思想，他坚持宗教在人的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有宗教教育才能培养真正完美的人。徐宗泽认为人为有灵动物，“夫有灵动物之作事也，莫不有一宗向，故教育之道，是在栽培人之所以为人，而人之所以为人，即在完美其性体，发展其知识，培植其德性，启导其信仰，成其信仰，成其性，完其体，以期得获人生之归向耳。”“造物主为人之归向”。¹徐宗泽注重宗教培养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知识只是一种载体，教育只是一种手段，只有精神教育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从小树立做大事的目标，不为世俗名利所奴，不为人生苦恼痛苦所扰。

徐宗泽的宗教教育思想，是他长期接受系统宗教思想教育和长期从事天主教文化事业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对于宗教和教育的理解都有较强系统性和学术性，我们可以从他发表的大量著作中找到答案²。对宗教教育意义的理解，徐宗泽比近代很多批判基督宗教教育的学者更客观、更真实，学理基础也更牢固，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等，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希望从传统中寻找一种精神的动力，以此来振奋国民的精神生活以此来抵抗西方基督宗教对国民精神的侵蚀，而徐宗泽对宗教本身的理解则更多的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体验。当然，徐宗泽所强调的宗教教育主要是指天主教教育，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辩证看待。

一 对公教教育的几点设想

徐宗泽在担任《圣教杂志》主编期间发表了大量关于公教教育的评论性文章，而且他一生都在从事与公教教育有关的工作，可以说徐宗泽也是一位公教教育家。近代公教教育不仅存在层次比较低，比较保守封闭等问题，还面临来自政府的立案、注册、“党化教育”等政策要求，面对来自教内教外的各种考验，作为一个公教教育者，徐宗泽是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作为一个兼习中西文化之长的知识分子，徐宗泽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在教会学校内的地位呢？

第一，广设学校以提高教友社会上的地位 针对近代整个天主教教育呈现出的低层次化、宗教化、孤立化等特点，很多天主教知识分子都积极呼吁教会应重视培养天主教高层人才，如马相伯、英敛之等，通过多开办学校来提高教徒们的素质等要求似乎成为当时一些天主教知识分子们的共识。徐宗泽认为教育能

¹ 徐宗泽：《何谓教育》，《圣教杂志》1926年6月。

² 《哲学史纲》（1928年编），《心理学概论》（1930年撰），《教育原理》（1934年编），《宗教研究概论》（1939年编）等。

改变一个人的贫困无知状况，提高人的社会地位。“学校是造就人才之所，本非以宣传宗教为目的。但是我们开设学校，造就公教人才，一旦人才辈出，在社会上服务，能以言行，为人表率，引人研究我教，岂不也是传教的一法”，¹这种通过学校教育来提高信徒社会地位，最终让更多人信教的传教方法，是徐宗泽一贯主张的，是一种通过文化教育来吸引信徒的和平传教政策，与20世纪后整个基督宗教都比较重视学校教育的历史大趋势是一致的。

他根据1924年的上海主教会议所通过的议决案，认为每一主教区域应设立一学，凡区域较大之区，应在交通便利之城市中多设几处，总铎区域设立高级小学，本铎区域则设初级小学，凡一主教区域之中学小学，彼此之间形成有系统的组织。现在办学校主要的困难是经费问题，虽然这个问题还不能一下解决，但信徒们应该努力克服这些困难，持一种积极态度去做，而不应一味的消极等待。对于当时公教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徐宗泽谈到：“因种种的关系，教中儿童有许多不方便，入外教小学攻读，至于入中学校的更是少数；我教中学校，又寥寥如晨星，而其所教所学者，又未能和时代吻合；适应人生的要求。”²这一点不仅涉及到多办学校，而且还涉及到公教学校应根据社会需要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

第二，组织全国性的公教教育机构 近代天主教教育不仅水平低而且很闭塞，学校与学校之间缺乏联系，对此徐宗泽也是深有同感，他建议组织全国性的公教教育机构。徐宗泽谈到新教在全国有中国基督教教育总会，总会之组织分为高等教育组、初等与中等教育组、成人教育组及宗教教育组，基督教各区之教育会每年又集常会一次，讨论教育事务等，新教教育机关之组织非常严密，相比之下，天主教所办学校虽然数量可观，但整体来看没有任何团体机关、教育会议、教育潮流、学术讨论，公教教育很闭塞，彼此之间也没有意见沟通、感情联络，因此他建议由各省学校选择富有教育经验之士组织个教育会，该教育会议商讨教育之进行、课程之纲要、课本之选择、教师之资格、教育之消息等事宜。中国当时有五大传教区，可在每一分区组织一会，再由主教区教育会选出委员，组成大区域教育会，后再由五大传教区选出委员，组成全国天主教教育总会，每年开委员年会，仿中华教育改进社及中华全国教育联合会或者基督教教育会。³

从上可知，徐宗泽对于当时公教教育内存在问题的分析是尖锐而深刻的，他通过与新教教育状况进行比较提出的诸多建议是很务实的，也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由于经费问题，及当时各国列强的不同修会在华划分各自的活动区域，国家与国家之间，修会与修会之间名目繁多，彼此互不往来，而中国本土神职人员地位不高，没有多少发言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当时中国天主教会事业的发展。

第三，加强公教教科书的编辑和公教学校的课程安排 因为近代北洋政

¹ 徐宗泽：《广设学校以提高教友社会上的地位》，《圣教杂志》1933年5月。

² 同上。

³ 徐宗泽：《几个教育问题》，《圣教杂志》1926年6月。

府、国民政府实行过几次大的教育体制改革，为了适应政府政策及社会需要的变化，教会学校在教科书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得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徐宗泽认为当时学校所用的教科书不适合公教学校使用，他从公教角度出发批判了国文、地理、历史、自然、公民等科目教材中的进化论、社会党思想（除算学外），主张教会应组织专门人员编辑教会学校内部使用的教材。如果能召集教育界开一次全国公教教育会议，商榷编辑教科书，分组任事，综合全国教育界之意见，编辑教中公共之课本，学校之课程纲要，那么这样整个公教教育就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教育方法，能做到提倡有人、任事有才，上有行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由于经费各方面的原因，徐宗泽也知道短时期很难做到这些，但他认为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可以先在小范围内进行，一个地方的学校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地方团体编辑部，而且编辑者可依各地方风土、人情、习尚及社会生活、传教状况的不同才定教材材料，因地制宜。¹

说到教材的编辑，徐宗泽本人就曾编辑过各方面的教材以供徐汇地区公教学校学生的学习，其所编书目前面“徐宗泽的生平”一部分中有列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历史、宗教等很多方面。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徐宗泽的知识面非常广泛，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尽职尽责的天主教神父，他关于三民主义、社会学、妇女问题等方面的大量论述，显示了他对于当时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及强烈的时代感。他不主张教会对于社会时代的变化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来自外界的各种攻击实行避而不谈的方法，而他认为教会应该采取一种积极面对的方法，对社会新出现的很多事物如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妇女解放等，可以根据天主教教义进行论述，让众多公教徒们对这些社会问题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而不是心存疑惑却得不到解决。

第四，加强公教学校师资力量的培养 近代教会师资人员的培养主要还是依赖于外国教会，要想实现中小学教会教育的发展还必须要重视本国神职人员的培养。徐宗泽认为要大量推广教中乡村小学，则需要培养大量小学校长及初高两个级别的教师。根据新学制的相关内容要求，师范学校修业年限六年，师范学校得单设后两年或后三年收受初级中学毕业生，为补充初级小学教员之不足，应设相当年期之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科；师范大学校修业年限六年，为补充初级中学教员之不足，得设两年之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校教员科或师范大学校，也可设于师范学校或高级中学，可接收师范学校及高级中学毕业生。在新学制的基础上，徐宗泽对于天主教筹设师范学校提出这样一些看法：每一主教区既当有小学及一初级中学，故当培植者是初级高级之小学教员及初级中学之教员，是以依各地方情形或设六年完全之师范学校，或设后期师范独立或附设于初级中学，或为补充小学中学教员之不足，设师范讲习科或师范专修科、师范学校，不必像中

¹徐宗泽：《几个教育问题》，《圣教杂志》1926年6月。

学小学一样普及各省，所以师范学校的设立只须在全国设立一部分学校就可。¹

由此可见，徐宗泽谈论的教会师范学校的发展计划，是以当时政府解决相关师范问题的学制为模本来开展的，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据，并非凭空想出，这种理想的发展模式对当时教会来说具有较强参考价值。

第五，天主教学校也应该去立案注册。在人民群众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强烈呼声下，国民政府对教会学校实行立案注册的政策，对于这一问题徐宗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谈到，“学校注册问题，鄙人认为当行之事”，“吾教中有许多学校已经注册，由政府认可，未注册之学校恐将来亦难免其事，待时而动可也”。²徐神父认为大学与专门学校的学生毕业后，无官职之考试，所以为学生的就业考虑，教会学校还是需要得到政府的认可。师范学校中，现在教员在国立学校教书的老师都需经教育行政官厅认可，故私立学校中的老师日后也会需要类似的条件，所以也应该去注册。至于中学，由于学生毕业后欲升入国立大学或转入专门学校，如果原学校没有注册，学生可能不能享受到注册学校学生同样的权利。对于小学，如果政府不加取缔或制止，现在似乎没有注册之必要，但按当时国家的法律要求，凡小学中学大学毕业生对于地方或一省或全国行政人员有选举之权，如果教中学生要享受公民之权利及选举权，学校应该去注册。

1928年5月15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在首都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徐宗泽也发表了评论性文章，在谈到“改进私立学校案”问题时，他说教育会议所公布议决案“尚称平允”，认为一个国家对于教育有取缔、鼓励、监视之权，国家要求私立学校立案，一为取缔不良之学校，一为统一教育之行政，本无可厚非。私立学校必须立案恐怕是迟早的事，虽然有一些学校没有立案仍存在，但学生毕业后升学等会遇到很多困难，而且有几个学校因不立案而导致被停办，这种举动无疑于“自杀”。³徐宗泽对于“天主教学校也应该立案注册”一事持基本肯定态度，但对于一些具体的规定也颇有微辞，如规定教会学校不能把宗教一课定为必修课，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因为很多教会学校也招收外教学生，所以徐宗泽认为此规定对于教外学生来说是合理的，但对于教中学生也如此则违背了“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这一原则。对于欲彻底取缔教会学校诸多特权的“立案注册”，徐宗泽作为一名天主教信仰者肯定也不愿看到教会发展处于萎缩状况，但他从全国形势出发考虑问题，认识到国家关于立案注册的规定合理之处，认为教会学校应该识大体，而不要采取消极抵抗的政策，采取抵抗做法并不利于传教活动的开展。

第六，公教学校要谨慎对待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党化教育”本来是广州国民政府为推进国民革命运动而确定的教育方针，但是随着蒋介石的背

¹ 徐宗泽：《几个教育问题》，《圣教杂志》1926年6月，第52页。

² 同上，第54页。

³ 徐宗泽：《全国教育会议与吾圣教教育之关系》，《圣教杂志》1929年第2期，第50页。

叛革命和宁汉合流，“党化教育”已蜕变为国民党对教育界进行思想控制和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党化教育”由于其宗旨的排他性，从一开始就与基督教教育的基督化宗旨相冲突。有的地方在《取缔私立学校条例》中明确规定，凡教育宗旨“违背国民党党义者”应予取缔，坚持基督化之宗旨的教会学校自然也就在取缔之列。为了强化“党化教育”的效果，国民政府要求所有学校都必须在每周一在总理遗像下举行仪式，宣读总理遗嘱，这种带有某种偶像崇拜性质的形式主义的做法，传教士们感到很难接受。¹

对此问题，徐宗泽是如何看待和解决的呢？徐宗泽在分析《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3月14日韦恂的《党化教育的意见和实施方法》和《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15期王西徽的相关评论性文章后，认为“教育者所以制造人之所以为人”，“今党化教育是以国民党党义为教育之目的；教育之宗旨只在训练党员，使学生信仰党纲，服从党义。”党化教育之根本与教育之宗旨是完全背离的，所以徐宗泽认为“凡施行党化教育之小学中学，教友不能送子女去求学。”如果在坚决抵抗和反对的基础上仍不能起作用，只能是“凡能有通融之处，于圣教会之精神，不妨害，可遵照国民政府之规定而迁就者”。²国民党作为一个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党纲的政党，一直想统一全国政局，建立独裁政治，虽然它进行的几次教育改革如教会学校的立案注册等政策，有利于加强对全国教育机构的管理，但是它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政策，把三民主义作为全民学习的内容，这些都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当初所提倡的“信仰自由”条款，是独裁统治的充分表现。作为教会人士，他们虽然都非常反对国民党的这些作法，但迫于形势压力也被迫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

第七，处理好教会学校的国文教育和外国语问题。对于教会学校存在的疏忽国文教育的现象，徐宗泽认为当时中学校最当注意提高者是国文一科，“今日中学毕业生，其国文之程度，真不堪闻问；非特国学之常识全无，且写一便条，而文欠通顺。原其故，或因学生之不喜研究国文，或因学校之太注重西文，兼之各种政治运动，学生被人利用，心惊外务，不肯苦志求学，而学问遂不进步矣！”³对此，作者为教中学校编了一国文课程，除必读课本外，还列出很多课外读物，其中包括《孟子》、《左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中庸》、《庄子》、《墨子》等中国传统古典文献。

该如何处理国文教育与外语教育间的关系呢？徐宗泽认为文字只是表达思想之工具，文言文比较雅，但难学，语体文则比较俗，但易懂，各中小学采用哪种语言应根据实际情况定，乡村平民小学当用国语，因为中国传统国文很难，与

¹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9-440页。

² 徐宗泽：《天主教与近今之政党》，《圣教杂志》1927年10月，第456页。

³ 徐宗泽：《中学学生当有之程度》，《圣教杂志》1927年5月，第220页

其在短期内学得一知半解,毕业后又不能采用,不如开始就学会用国文如何表意,此乃平民之学。到了中学,理当趋重文言文,阅读古文名家、四书五经,以保国学之精粹,此乃贵族之文学。语体文、文言文二者应结合起来使用,以便更好发挥各自的效应。对于外国语,1920年教育部出台的新学制规定小学无外国语一科,而中学则列为必修科,对此徐宗泽提出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当时社会学生求学大多为求生计,西方经济势力在华扩张提供大量需用英文的工作岗位,使很多学生重视英文,藐视国文,花很多时间、金钱去学英文,而忽视文科和中文,这是得不偿失。其实外国语并非人人所必需,非普通学科,所以他建议把外国语改为选修课,最后他强调“一国之教育,有一国教育之国性,中国教育习以欧化性,而失其国性,此则甚无谓也”。¹徐宗泽的这些想法在1928年5月教育部通过的一些文件中也有体现,其第一个议案为,初中以下学校之教科书,除外国语外,不得采用外国文课本案,这是因为发现当时中国初中以下学校之科学教科书,间有用西文原本,而实际上初中学生外国语程度较低,如果用西文原本教学,则学生的全部注意力必定集中于学习西文,这种做法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忽视了国民教育的本旨。解决办法是由大学院通令全国初级中学以下各学校,除外国语外,各教科概采用中文本,不得再用西文本。第二个议决保留案,即中学外国语一科,一律改为选修科。第三个议决案为小学校课程一律废除外国语,中学入学考试不得有外国语一科。

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教会在中国办学校开始,教会学校一直以外语教学为特色,由于其运用性强吸引了很多学生进入教会学校,教会在中学创办了大量的学校,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新教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对于近代中国教学事业影响深远,但是辛亥革命后,随着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反基督教及收回教育权等运动使教育中国化成为一大趋势。²在这种情况下,外语教学问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它是人们对于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间关系进行反思的一种表现,像徐宗泽这样的公教教育者,更多的是从教育学角度谈论教育应该有实用性,应该符合中国的国民性,因此他很支持国民政府的教育中国化政策。

二 小结

以上关于徐宗泽对于当时公教教育一些问题看法的总结,大的方面包括建立全国性的教育机构、教会学校应去立案注册,小的方面包括师资力量的培养、课程设置等,关于公教学校改革的诸多意见包含着徐宗泽对于公教教育事业的关心,其强烈的时代感、开放性、爱国心、实用化等特点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徐宗泽在他的一篇文章《对于公教学校几个感想》中对他的公教办学思想作过一些

¹徐宗泽:《教育当有之标目》,《圣教杂志》1930年第5期。

²杰西·格·卢茨著,曾炬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1-78页。

非常概念化的总结，是理解其公教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公教办学思想归纳为六点：时代化，主要指应当吸取现代教育改革中合理的成份，在课程的编制、教授的方法，管理的设施，校舍的布置都要趋时代化；应用化，指教育的科目要适合于社会上的生活情形，适合于各人的个性，使学生在学校中所学的知识将来在社会上足以有应用，各人凭借自己的技能在社会上谋生；减学费，通过减学费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中国化，指教育学制当按我国的历史、习惯、风俗、文物、制度来规定，公教学校方面的课程，教授方法等都要中国化，如教科书的取材要注意符合我国的国性国格，多关心本国事；自动力，指教育当发展各人的特别长处，使之能自用其能力，而不是被动的；开通化，指教育应当用公正宽大的眼光，来栽培学生的判断，不当用偏狭的思想束缚青年的进展路程，做为一个现代学生，应当能应付现代潮流为第一任务，所以现代学生只知课程所定的科目还不够，还要有应付现代潮流的常识，如社会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经济法律问题和一切生活问题，所以关于这些问题的报章杂志书籍等，当允可学生浏览。公教办学要和外人多接洽，多交换意见，这样才能更有益于人的发展，否则独自为政，绝不是育人才的好方法。¹

徐宗泽对公教教育所提出的这七点想法，是他公教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对当时公教教育改革方向的希望。对于当时公教教育存在的问题，徐宗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改进方案。另一方面面临来自当局政府的立案注册、实行“党化教育”等政策，徐宗泽从宏观角度出发，主张教会学校应该与政府配合。他这一主张与当时大多数教会人士的意见一致，对于其原因学者胡卫清曾这样分析：“中国教会人士之所以倾向于积极注册，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们能直接感觉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如果教会学校不注册，他们的子女就会受到社会的歧视，不能享受完全的国民权利，不能进入仕途，不能公派留学；二是随着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力量的增强，他们的教会本色化愿望愈益强烈，希望摆脱对西方传教士的依附地位，自己管理教会事业，当然包括教育事业。”²

作为中国近代天主教知识分子，徐宗泽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他尊重教育，注重人才培养的科学性、实用性、综合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徐宗泽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强调公教人才培养一定不能脱离中国文化这个大环境，培养的人才要符合中国国民性，要为中国社会所需要。除了在课程上要重视学习国文和一些中国古典著作的学习外，公教还要通过普及教育来提高广大信徒的社会地位等，徐宗泽企图通过这些方法使天主教更好的融入中国社会，使天主教信徒更好的适应社会需要，这些也构成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¹ 徐宗泽：《对于公教学校几个感想》，《圣教杂志》1933年3月。

²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第六章 徐宗泽的社会政治观

尽管天主教一贯强调政教分离,但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它最终不可能与政治脱缘。纵观近代中国天主教会,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20世纪的中国社会非常动荡,国共两党既有合作也有斗争,社会涌现很多富有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如劳工问题,妇女问题等,尤其是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面临着亡国来种的危险,对于以上这些种种社会政治问题,身为近代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徐宗泽,他在主编《圣教杂志》期间发表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三民主义、爱国、战争等主题的文章,成为《圣教杂志》的一大特色。徐宗泽是如何解释公教的国家民族观,是如何分析当时社会的劳工问题,是如何讨论战争爱国问题的呢?

一 从公教角度理解的国家观

徐宗泽作为一个受过系统宗教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必定学习过西方政治思想史、宗教哲学史,阅读过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著作,因为他在《圣教杂志》上发表的大量关于国家的产生,个人与国家之间、家庭与国家之间、公教会与个人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文章。

徐宗泽谈到“国家者,团集家庭而成,为人民谋现世之幸福者也。幸福而曰现世,缘现世后,有永世之幸福故;永世之幸福,即人得归其所,当享之永福也。”¹对于组织国家时所需要的权柄问题,徐宗泽肯定了权柄的重要性,“人组织社会,需要社会,以个人之力,不能谋人生所不可缺之利益;故结会立社以共谋之;社会所谋者,是人民公益。谋公益之责者,乃在社会之首领;首领要尽厥责,当有权柄;权柄之要素,所以为社会造福也。盖强者护弱,富者济贫,智者化愚,能者助弱,岂非为人生当然之务乎?”²权力的产生,及各种权力的赋予都是为了使人类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所以国家的组成也是为实现人类的现世幸福而产生的,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局面,人民都应该服从当权者,“若有无理强占国权,推翻政府者;为社会之安全秩序起见,人亦当服从当权者,非服从其僭窃柄权也,乃服从其所出之合理命令也。”³以上言论均来自托马斯·阿奎那的国家论和君主制思想,都充分肯定了国家在人类历史中产生的重要性,国家能保障人类权利义务,有利于人类实现幸福。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7-1274)所处的时代,他所指政治体制就是君主制,但阿奎那并没

¹ 徐宗泽:《组成国家之核心》,《圣教杂志》1931年第10期,第578页。

² 徐宗泽:《有权者当知如何无权者当知如何服权》,《圣教杂志》1931年4月,第198页。

³ 同上,第202页。

有象后来极端的教权主义者那样将国家完全置于教会之下，而是肯定了国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合理性，这是阿奎那思想的独到之处。¹而徐宗泽所指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国民党的民主共和制，徐宗泽把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借鉴和挪用到中国，成为他解决中国社会实现问题提出的一种方法。

国家建立的是现实之国，超越现实之国的是天主建立的理想之国。天主在人类社会的有形机构便是罗马教会。公教会与个人之间，“无论人民，无论元首，未尝因入教而失其国籍，失其国民之资格，失其公民之权利；未尝因入教，而能抛弃国民之义务，而能轻视己国之文物制度，而能绝去爱国之思想，而且反是，人因入教而更当保护己国之国粹，己国之国光，己国之国格”²公教会与国家之间，彼此独立，互不隶属。公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人民谋求来世之永福，国家是为了人民谋求现世之幸福。国家与国家之间，应按照天主教义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各尽其义务，以保护世界的秩序。这些是徐宗泽根据其教育所提出的是一种基督教理想主义国家观。

这种理想主义国家观产生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尽管它所提倡的信义爱德等理念在近代中国也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注意，但那毕竟不可能在中国社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建国理论。与马相伯的“神我宪政说”一样，徐宗泽的宗教国家观只是一种理想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点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所学的西方政治理论对徐宗泽思想形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他鼓励信徒积极关心社会政治，主张教育要注重适合中国国情，培养真正的中国人，支持维护国家利益的正义战争等等，无不受其宗教国家观的影响，可以说理解徐宗泽的宗教国家观是理解他相关社会政治言论的基础。

二 对社会劳工问题的分析

在谈论徐宗泽社会政治理论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公教史上的一份重要通谕，即教宗良十三世³他于1891年发表的那篇《新事物通谕》(Rerum novarum)，又名劳工问题。该通谕被一些教内学者认为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位教宗用系统的方式谈及各种伴随工业革命而出现的十分复杂的问题。⁴直到今天，这一通谕依旧是各国天主教内进行社会训导的一个重要内容。《圣教杂志》1928年第2期到第9期，就刊载了这一通牒的译稿。1931年是该通牒发布四十周年纪念，编者徐宗泽在该年第6期首发表了纪念性文章。所谓“新事物”即劳工问题，随着资

¹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1-408页。

² 徐宗泽：《圣教会与个人与国家与国际之关系》，《圣教杂志》1932年3月，第132页。

³ 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1810-1903)，第258任罗马教宗(1878-1903)。被称为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后一个老托马斯主义者，又是现代经院哲学新托马斯主义的创始人。

⁴ Herve Carrier, S. J. 著，李燕鹏译：《重读天主教社会训导》，1992年5月初版，光启出版社天主教会的社会训导文件。

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在全世界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日益分化成两个阶级，一个是人数较少的资产阶级，一个是占社会绝大多部分的工人阶级，两个阶级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有钱人更加有钱，穷人更加贫困，工人们的生存状况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剧烈。为了解决这种矛盾，社会主义者主张废除私有制，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财产公共所有，而天主教认为私有制“出自人类天性”，属于“基本人权”，所以反对社会主义理论。至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天主教会主张工人和资本家“协作”，反对工人斗争和暴力革命，该通谕主张通过宗教和教会调解两阶级间的矛盾。

教宗良十三所发布的《劳工通谕》在当时公教界有重要影响，是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兴起的历史形势所做出的反应，所谈论的问题也符合20世纪初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徐宗泽的大量关于社会劳工问题的看法都是来自这一教会通谕。在1927年第7期上徐宗泽发表了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社会主义的鸟瞰》，1928年第7期到第9期连续刊载了《天主教与社会问题》，1938年第8期《马克思共产主义译述》，还有很多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章，如社会经济概论、劳动概论、劳动契约、工资概论等。¹在《社会主义的鸟瞰》的文中，徐宗泽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几种形式：集产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几个派别：乌托邦派即圣西门、傅利叶、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科学派即马克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行派主要是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活动等。

徐宗泽认为社会主义主张废除私有制，取消婚姻制，排斥宗教，而这些与天主教教义是极端冲突的，所以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理论。但天主教反对的只是社会主义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并非反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切，至少社会主义理论希望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一出发点与天主教的信义道德是一致的，徐宗泽也非常清楚社会主义想要现实的理想，即“行了社会主义后，一切社会公用的东西归社会公用的制度，可以消减贫穷，消减许多因贫穷直接产生出来的罪恶，如教育不普及，放纵私欲，许多恶劣风尚，和许多犯罪的事情！至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是承认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最重要最可尊贵的功用。所以将来的社会建设在人类劳动的基础上，而大同之世，乃实现了！”²

在天主教会看来，社会的病源并非私有制，私有制是出自人性的，不应被铲除，只有信奉天主才能真正解除世间的痛苦。“以公义与爱德示人为解决是问题之原则，又今劳资以此为职责各尽自己之本分与义务，再藉国家之完备法律与劳资问题各种组合，由圣教会伦理之化导力同力协作以求改良劳动者之生活法，

¹ 《社会经济之释义》1927年第12期，《社会经济概论》1928年第5期、第6期，《经济学思想史概观》1933年第5期、第7期等。

² 徐宗泽：《社会主义的鸟瞰》，《圣教杂志》1927年7月，第316页。

解决社会问题之圆满方法其在斯乎？”¹一方面要求工人们规规矩矩履行与雇主所定的契约，安慰工人们现在所受的苦是为了将来享永世之福，正如基督用自己的苦难来替人类赎罪一样，不要使用暴力，可以通过一些合法的劳工组织来争取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要求资本家也要顾及到工人的劳动强度、生存状况，给予工人按劳动所计的工资，还要给养家工资，还应该实行爱德与公义之救济施舍。此外，教会也应积极响应社会革新，可以设立贫困基金进行直接救济，作为国家，应该保护人们的私有财产及其它一些合法权益，注重劳苦大众的福利待遇，努力维持社会的稳定有序。²这是一种明显的阶级调和理论。

由此可见，徐宗泽从天主教信义爱德立场出来，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后社会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矛盾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工人生活贫困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徐宗泽并不是完全赞同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一战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使人们对这一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废除私有制、主张人人平等、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也是从天主教教义出发，徐宗泽对于社会主义想要建立的大同社会这一理想，也是比较同情的。徐宗泽反对剧烈的社会暴力革命，主张实行社会改良，在近代社会很多知识分子与徐宗泽一样持有这种社会改良思想，如马相伯、梁启超、胡适等都倾向于改革而不是革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社会改良思想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法。当然，我们对于徐宗泽及其所主编的《圣教杂志》对于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过激言论也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三 对三民主义问题的分析

1927年革命军北伐，国民党大量宣传三民主义，1928年5月15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召开了全国教育会议，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这次会议上确定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的宗旨。³这一国民党的独裁政策，使天主教面临着这样一些问题：“教友能入国民党否？教友在孙总理像前能行三鞠躬礼否？教会学校是否要以三民主义为教材对于学生进行教育否？”⁴面对这些新形势下的政治问题，徐宗泽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来给信徒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在谈到“教友在孙总理像前能行三鞠躬礼否？”这一问题时，他说“凡有功于国家之大人物，科学之伟人等，亦能立像以敬之者。此等敬礼，只表示一般尊敬之心，并无宗教性者。”“子女跪在父母前，以行其孝爱之心”，此未尝不可，

¹ 徐宗泽：《天主教与社会问题》，《圣教杂志》1928年第7期，第290页。

² 徐宗泽：《天主教与社会问题》，《圣教杂志》1928年第7-9期。

³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0页。

⁴ 徐宗泽：《天主教与近今之政党》，《圣教杂志》1927年10月，第434页。

但是“教友在父母之棺前，不能行跪拜礼者，以此礼之宗旨有宗教性，并非只表示孝爱追思之旨故耳。”虽然徐宗泽认为对孙中山先生鞠躬并没有与其宗教信仰有很大冲突，但是他认为“此鞠躬礼国民党视为各种开会，各种演讲时所不可少之一要素；且加以恭读孙文遗嘱，事类祷告。党员之意，岂日后将规定一宗教敬礼乎？在此情境，则教友万无可行之理。”¹

徐宗泽以上这番话包含了很多内涵，关于祭祀祖先、敬拜父母这一中国传统礼节，天主教信徒们是否可以参加这个问题，曾是清初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礼仪之争”的重要争论焦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场争论导致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次中断。²鸦片战争后罗马天主教势力再次来华，关于两百多年前的那场争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中外信徒开始承认和接受中国关于祖先的很多祭祀传统，努力寻求天主教中国化的融合，如马相伯就认为中国人祭祀祖先只是表示对先人的尊敬和缅怀，是一种情感表达，没有宗教性质等。但徐宗泽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坚持认为信徒们不能参加任何非天主教的具有宗教性质的祭祀、礼拜活动，国民党实行“党化教育”，独裁统治，试图把国民党的党纲、意旨通过一系列的形式宣传变成人们的一种政治信仰，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质，所以徐宗泽也予以了坚决的反对。

对于“教友能看三民主义书籍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徐宗泽发表了大量关于三民主义的介绍文章，为了便于教会学生正确看待和学习三民主义的内容，1930年4月土山湾印书馆就发行了他主编的《三民主义节要》，该书系统介绍了三民主义的内容，由当时国民党教育部长蒋梦麟所作序³，书名由当时立法院院长胡汉民题字，参考书目有：民智书局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吴稚晖的《中山先生年系》、太平洋书店的《中山业书》、邵元冲主编的《建国月刊》（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可见徐宗泽当时关于三民主义的一些言论同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他在《圣教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三民主义教育公评》（1928年第10期）、1929年第10期开始至1930年第11期连载的《三民主义之分析》、《三民主义与天主教学校》（1930年第11期）。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是希望中国振兴，是一种爱国主义；“民权主义”是想促进平民政治之平等，但此权非天生出来的，是时势和潮流所造就出来的，所以徐宗泽认为孙中山先生是反对卢梭的人生而平等理论的；“民生主义”，包括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与天主教会的教义是相违背的，对此徐宗泽也坚决反对，孙中山先生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徐宗泽分析认为，民生主义虽名称上与马克斯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样，但其实质上是不一样，因为民生主义是通过一种和平方式实现的，而

¹ 徐宗泽：《天主教与近今之政党》，《圣教杂志》1927年10月，第434页。

² （意）白佐良、马西尼著：《意大利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33-187页，又见诺尔编著，沈保义、顾卫民、朱静译：《中国礼仪之争西文文献一百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³ 1928年11月1日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出任部长。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要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

总之，迫于外界政治压力，徐宗泽在《圣教杂志》上谈论三民主义问题时的基本态度是接受，“公教学校，以三民主义列入课程，如前清之四书五经而至矣；四书五经讲义各得自由，且以能自由，而讲理则愈出不穷，而读者亦穷年不厌也。”¹这种大而化之的无奈态度到了1936年时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国民党在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陷入困境，徐主编在回顾以前的历史话题时直接道出了当时作为主编杂志在言论导向上的艰难处境，“吾天主教人之意见有宽严二派之不同，有神长与教友意见之殊异；问题既与教理教律有关系；且此等问题之背景与环境，犹在变化未定之中，即国民党之最高机关中人对于上言之各问题，亦未有正式之规定，今要本社具体地答复，诚难之又难也。”对当时发表的文章，徐主编觉得它们太多顾虑，“周旋于二宽严不同意见之间，使毋不及；对外又不可出以宽容态度；盖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是不可评论的，而国民党之主张又不能侵犯的；本志论文负责之重，非身处其境者不知也。”²从以上一席话，我们能体会《圣教杂志》作为一份公教机关刊物，徐宗泽作为该刊的主编，在面对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政策时，为了在言论导向上处理好公教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为了在思想信仰上处理好信徒们心中的困惑，徐宗泽和《圣教杂志》承担了很多的责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 对战争、爱国问题的分析

近代天主教是借助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的，历史的积怨使基督宗教一直难以摆脱“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天主教是帝国主义”等头衔，19世纪末的一系列教案也使外国教士日益意识到曾经帮助他们进入中国传教的工具，后来却变成了它们在中国立足的障碍，所以进入20世纪后天主教会积极努力使自己摆脱“洋教”的称号，其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支持天主教的本土化运动，通过培养本地神职人员使天主教事业的管理中国化，希望以此来逐步划清天主教与殖民主义势力间的关系。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后，中国天主教会内很多爱国信徒纷纷发表抗日救国言论，《益世报》、《磐石杂志》、《圣教杂志》等教会报刊都发表有很多爱国报道，应《益世报》之邀，九十二岁高龄的马相伯向华北同胞发表十二篇演说，高呼“还我河山”，《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出版了一期《公教与爱国》专号，刊登了马相伯、雷鸣远抗日手迹，于斌卷首语中写到：“我们公教人深切希望世界和平，极讲国际间的正义人道，尊重别民族的正当权利，不嫉视别个国家繁荣向上；同时却也不甘心受强暴的侵略。良心也不许我们对本国利益采取

¹ 徐宗泽：《三民主义与天主教学校》，《圣教杂志》1930年第11期，第481页。

² 徐宗泽：《二十五年之圣教杂志》，《圣教杂志》1936年第12期，第717页。

旁观的态度。所以我所谓的民族意识并非过激又不背正理，人人应当设法培养。”¹《圣教杂志》上刊登了陆徵祥²关于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满洲国”的长论，该文回顾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往事和现有事实，然后摘录比利时梅西爱枢机在他的祖国被占领时（1914-1918），用关于正义和爱德在国家受敌人不义的侵占时所当引用的几种天主教信理的原则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些来证明和指责日本的侵华事实。³中国天主教信徒们爱国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源自于人类天生的爱国爱家的朴素情感，另一方面也与20世纪开始的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使中国信徒的自立意识增强有关。

徐宗泽在主编《圣教杂志》期间，也发表了自己对于战争、爱国问题的看法，如《战争与爱国》、《天主上智亨毒中之战争》、《战争论》等。按照《圣经》教义，天主教是反对暴力战争的，因为战争扰乱社会和平、破坏人类秩序，应极力避免，但奥古斯丁说过：“不应该利用和平来预备战争，只该为了求得和平才战。”所以徐宗泽认为日本侵略中国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扰乱公义理，是侵略战争，故中国教徒应该奋起自卫。至于反抗的手段，徐宗泽认为应严格按照国际公法进行，任何虐待降兵、残杀无械敌军；使用毒箭、毒气、散布瘟疫病微生物、失信谎骗等野蛮行为都是严禁的，对于敌国人，如妇孺老幼，不得伤犯及之；对于物，不动公产如兵工场、火药局、粮厂等外军可自由处置，对于敌国人民的私产，不得占据或损毁。如正义之国战胜，可收国被敌军占据的国土，可要求敌国补偿交战中所受的损伤，除此以外，不能再有要求割地赔款等有背公义的要求。⁴由此可见徐宗泽关于战争的界定是站在国际公法的角度来定义的。

在谈到爱国时，他分析了国家观念的产生，国家的构成，爱国心的组成等。徐宗泽认为国家的构成主要包括人民、领土、政府及主权，还包括血统、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宗教等，故爱国也体现为爱这个国家的这些组成部分，这种爱国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但此爱国精神“非崇拜我国，高抬我国，以为我国是天潢之子，具有特别之优长，而排斥他国者也”，“爱国心是合理顺义者也；合理顺义之爱国，不侵犯他国之领土与主权，不侮辱他国尊荣，不疾视他国之进步者也。然与他国并立于世，互相友爱，互相协助，各尊敬彼此之权利，各尽彼此之义务，以巩固世界之和平秩序为前提。”⁵由此可见徐宗泽的爱国观是建立在世界各国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基础上的，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这与天主教所宣扬的“天主分给我们各人的一部分世界——就是我们的国家”⁶的思想有关。天主教的历史和教义决定该宗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它传教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世

¹ 于斌：《公教人的爱国精神》，《磐石杂志》第2卷第5期。

² 罗光：《陆徵祥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41-50页。

³ 陆徵祥：《在天主教道理下评判之“满洲国”》，《圣教杂志》1934年4月。

⁴ 徐宗泽：《战争与爱国》，《圣教杂志》1937年第11期，第645页。

⁵ 同上。

⁶ 同上。

界的人民都成为上帝的子民，希望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所以天主教信徒们对于战争和爱国首先也是从世界主义角度来进行分析的。

尽管徐宗泽提倡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建立在世界主义基础之上的，但这一点并不妨碍他强烈爱国精神的表达。自1931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爆发后，徐宗泽任主编的《圣教杂志》每期后面的“教中新闻”、“时事摘要”等栏目大都会刊登信徒们的爱国义举或抗战前线最新的时事信息，徐宗泽曾这样回答一个信徒的来信：“做了一个教友，仍是一个国民，故当爱国，且教友爱国，更当超过平常人爱国。”¹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宗泽发表文章号召信徒们进行祈祷，“前线之战士为我中华民族争生存而捐生命，居于后方之吾人，为战争之英雄”，“我侪盍同心同意，为中国复兴祈求，为中国最后之胜利祈求，为中国最高之军事长官祈求，为前线之军士祈求”²，鼓励人们对战争抱乐观态度，从前线士兵的英勇牺牲，人民吃苦耐劳精神，社会救济队伍的友援等几个方面分析，认为国人当对战争持乐观精神。³他还号召人们在国家存亡之际团结抗日，建议人们注意改良生活习惯及生活组织以增进民众自治之能力，同时在整顿吏治、加强社会组织方面多加努力。据方豪回忆，“在昆明时，最初我们还能常通信，信上总是告诉我：‘沪上民心不死，人人怀必胜之念’。”⁴徐主编的爱国心是强烈而博大的。

徐宗泽这种对于战争爱国的看法和态度，在近代基督宗教信徒中是非常普遍的。抗战爆发后，基督宗教徒们自发的组织营救队救济灾民，一些慈善机构、医院、学校也成为救护伤兵、安置灾民的场所，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中国天主教信徒们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成果，是中国本土信徒自立意识增强、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

五 小结

以上从公教角度理解的国家观、对社会劳工问题的分析、对三民主义问题的分析、对战争爱国问题的分析四个方面分析了徐宗泽的社会政治思想，虽然徐宗泽一生没有什么参加政界从事什么政治活动，但从其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社会问题也非常关注，与马相伯、陆徵祥、于斌等教内社会活动家私交甚好，与当时社会政界人物如当时教育部部长蒋梦麟也有书信往来。徐宗泽的社会改良意识、对国民党三民主义理论的研究、对战争爱国分析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这些思想都与他所信仰的天主教教义有关，在近代基督宗教界内有很多与他持相同主张的人。

¹ 徐宗泽：《通讯》，《圣教杂志》1932年第3期，第178页。

² 徐宗泽：《抗战时期中吾人之祈祷》，《圣教杂志》1937年第10期。

³ 徐宗泽：《对于战争我们当抱乐观》，《圣教杂志》1938年第1期。

⁴ 方豪：《我怀念徐润农神父》，《方豪六十自定稿》第2572页。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徐宗泽作为一名近代天主教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是非常关注的,而且他也鼓励其它信徒也去积极关心社会事业,“我国教友多安分守己,对于尽教友之本分,固绰然有余,但对于社会上之事业,犹欠完美,此所以圣教精神,无由深入于社会。为今之计,当一改其习尚;凡地方上任何事业,任何工作,不特当与分其事,俾能与教外人多有接触;且该积极提倡,而为地方上之领袖。”¹徐宗泽这种社会参与意识在近代中国天主教会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在华的天主教会,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增加教会信徒的人数,扩展教会的规模,增加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对急速变动的社会潮流作出回应。”²虽然当时公教界也有公教进行会、公教青年会这样两个社会团体,但总体而言近代中国天主教会相对于新教对于社会潮流的反应比较保守和冷淡,这从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着近代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进程。

¹ 徐宗泽:《鼓励教友热心社会事业》,《圣教杂志》1932年10月。

²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352页。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白了徐宗泽身上所具有的各种特性,即作为一个耶稣会士对文化的关怀,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对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作为一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内的一个工作者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支持和参与,在文章结尾部分本人从以上三方面对徐宗泽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的特征作了一些小结。

1、作为一个耶稣会士的文化关怀

鸦片战争后外国耶稣会团体借助不平等条约再次来华,徐宗泽便是近代法国耶稣会在上海培养的一名耶稣会士。耶稣会¹作为天主教的一个修会,从其创办人罗耀拉开始便一直坚持文化传教的政策,利玛窦、汤若望等明清来华耶稣会士亦如此,而且这一政策在中国行之有效,徐宗泽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对于中西文化持有一种特殊的关怀。他一生都在从事与天主教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对中国天主教史及明清耶稣会士等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与收集,主编教会杂志,管理徐家汇藏书楼等,这些都是文化性很强的工作。而近代中国天主教会内的文化工作存在很多问题,如教会内信徒的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公教学校里的学生热中于学习外语而疏于对中国传统国学的学习,中国公教界内仍然以外国传教士居多,而绝大多数外国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了解程度都非常欠缺等。²徐宗泽也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他努力用自己的文化工作来弥补当时中国天主教内存在的这些问题和不足。

对公教文化研究工作的热爱已经融入到徐宗泽的生命中去了,在担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的二十余年里,他积极收集各方资料,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仍然不放弃收集地方志的工作。他与近代学界人士交往甚深,为探讨明清耶稣会士的一些历史问题,经常与马相伯、陈垣、方豪等学人书信往来不断。“抗战胜利后,徐宗泽最大的两个愿望就是:一、将藏书楼改为现代化图书馆,公诸社会;二、恢复《圣教杂志》,但这些都没有得到教会支持,徐宗泽修养很高,也没有怨言。”³徐宗泽对于近代公教文化的默默奉献也得到很多近代学人的高度评价,在他逝世后,教内外知名人士及他曾经的学生、教友,都纷纷发表悼念性的文章来追忆徐宗泽生前的点点滴滴。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徐宗泽的宗教信仰中文化只是一种工具、

¹ “耶稣会的创始者是一位西班牙的军官、狂热的天主教徒伊格纳修斯·罗耀拉(1491-1556)。1534年,他在法国巴黎学习时与同道五人组成了‘耶稣会’,其目的是反击新教教派的主张;维护天主教的地位;增进天主教的利益;并且渗透新教地区,宣扬天主教义。1540年,罗马教皇正式承认耶稣会是符合罗马教会宗旨的教团组织。耶稣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采取了传教、忏悔和教育等活动方式,而它的教育活动则最具特色。”见姚立昕:《试论近代早期耶稣会教育的特色》,《宁波大学学报》2002年8月。

² 马相伯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英敛之《劝学罪言》等文章就是针对教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而发的。

³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324页。

一种手段，文化的存在价值在于更好的诠释天主教这样一种信仰。重视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教，希望通过文化传教这种方法，达到使信教者建立牢固的宗教信仰的目的。不管是研究中国天主教史还是主编《圣教杂志》，徐宗泽言论最后的落脚点都是信仰天主教，这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从客观效果来说，他对明清耶稣会士相关资料所做的大量收集整理工作，对公教历史及文化的介绍等，起到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有利于消除公教在近代国民心中封闭保守的印象，同时，为后来学者对公教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这些都是由文化这一特殊媒介的丰富内涵所决定的。

2、虔诚的宗教信仰

徐宗泽作为一名接受过耶稣会系统训练的天主教信徒，宗教观是他看待很多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不管是对于学校教育是否需要宗教，还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要靠什么来维持，还是用什么来最终消除人类战争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徐宗泽无不从宗教学及其宗教信仰出发来考虑。

徐宗泽的宗教信仰是非常虔诚的，这使得他的很多言论比较谨慎，在这一点上徐宗泽与当时的教会人士马相伯（1840-1939）、英敛之（1867-1926）有一些差异。马相伯虽然也是天主教世家出生，从小接受耶稣会教育，但在他 37 岁那年（1876）由于对当时耶稣会内一些现象的不满而退出了耶稣会，随即进入官司场，直到 21 年以后，他重返教会。¹相比之下，徐宗泽对于罗马教会则非常忠诚，他一生的文化工作都是在教内进行的，始终没有脱离过教会。英敛之是在马相伯的帮助和鼓励下信奉公教的，他对于教内存在的问题敢于直抒己见，言辞激烈。英敛之着手创办了社会性较强的报刊《大公报》，在 1918 年 6 月发表的《劝学罪言》中尖锐的批评了当时公教界内信徒文化水平低，不重视中国文化研究的现象等。²而徐宗泽却是在教会内办报刊，所以他没有英敛之在社会上办报那样自由，言论那样大胆。

虽然徐宗泽心里也明白当时外国教士控制中国教会的种种弊端，但为人谦逊的他似乎有些“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这与他青年时接受过耶稣会的“四绝”训练有关，即绝财、绝色、绝意、绝对效忠教宗，也与当时中国教士在教会内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客观现象有关。当然徐宗泽这种谦卑忠诚的宗教修养在得到教内人士高度赞扬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造就了他的局限性，即不敢超越教会的条条框框，言论保守谨慎。对罗马教会的忠诚使他不乏美化教会史的言论，在国共关系上有些言论比较偏激，存在不少错误，对于这些我们应该辩证客观的看待。

¹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第 1172 页。

²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309 页。

3、对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关注和参与

徐宗泽是 20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一代天主教信徒，相对于 1862 年马相伯、李问渔等成为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第一批学生的那个时代，20 世纪初中国天主教会取得很大的进步，本土神职人员数量有了较大的增加，信徒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一定提高，自觉意识也在觉醒。但是信徒整体文化水平低，外国教士掌控中国教会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环境下，徐宗泽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着自己对本土化的理解和看法。

徐宗泽虽然没有集中谈论本土化这个问题，但是他以自己良好的国学修养，踏实的工作精神在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20 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基督宗教因其与外国侵略势力间的紧密联系而遭到国人的强烈反对，如何使中国天主教会摆脱“洋教”的色彩，摆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样的称号，成为 20 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徐宗泽主张公教教育应该注重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强调教育的“中国化”。对于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立案注册的问题，当时很多教会人士都表示反对，但徐宗泽则主张教会学校应该去立案注册，应该去接受政府的统一管理，这是一种不愿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不愿与社会对立的举动，其本身是希望参与到中国社会变革之中去，是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对于日本的侵略战争，徐宗泽从公教教义角度出发虽然也强调了世界主义，但他并没有一味的淹没在世界主义之中，而是强调教友应该比平常人更爱国，鼓励人们对抗战充满信心。徐宗泽身上所体现出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是中国本土神职人员自觉意识不断觉醒的表现。

此外，徐宗泽对本土化的关注和参与还表现在他对于当时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积极回应态度，希望拉近教会与社会间的距离。20 世纪中国社会涌现出很多社会问题及政治理论，如劳工问题、三民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于这些徐宗泽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识，积极关心社会问题，提出一些社会改良建议，他完全不同于 19 世纪的天主教信徒，也不像 20 世纪初教会内一些信徒那样终日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过日子。徐宗泽表现的是一种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逃避的态度，尽管他所提的一些改良意见不一定有可行性，而且外国教会对他的很多看法也不一定予以承认，但徐宗泽身上所体现出的这样一种朝气是值得肯定的，也成为 20 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一个新动向。

总体而言，徐宗泽是近代中国一位知识非常渊博、信仰非常虔诚、爱国情感非常真挚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以上关于他的生平著述及教育、社会政治思想的叙述，使大家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信徒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有一个粗浅的认识。

参考文献

一、资料（以责任者姓氏拼音为序，同一责任者则按出版先后）

- (1) 陈方中著：《于斌枢机传》，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 (2)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 (3)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二卷），台北学生书局 1969 年。
- (4)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 1969 年。
- (5)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上中下），中华书局 1988 年。
- (6) 《刚恒毅枢机回忆录》（台），主徒会编印 1992 年。
- (7)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
- (8)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 2000 年。
- (9)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 1989 年。
- (10) 李东华著：《方豪先生年谱》（台）国史馆印行，2001 年。
- (11) 马长林、吴小新《中国教会文献目录：上海市档案馆珍藏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 (12) 《磐石杂志》1932 年——1937 年，北平辅仁大学中华公教青年会磐石杂志社。
- (13) 阮仁泽、高振农：《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7 月，“上海天主教史”。
- (14) 孙金富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
- (15) 《圣教杂志》1912 年 1 月——1938 年 8 月，圣教杂志出版社。
- (16) 《圣心报》1937 年 1 月 1 日——1949 年 5 月 15 日。
- (17) 《上智编译馆馆刊》（北京），1946 年 11 月——1948 年 6 月。
- (18) 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西文珍本目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 (19) （法）史式徽著：《江南传教史》（上）（下）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
- (20)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 2001 年 12 月。
- (21)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 (22) 徐宗泽：《国家真诠》，上海圣教杂志社 1926 年 8 月。
- (23) 徐宗泽：《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26 年 4 月。
- (24) 徐宗泽：《神学提纲》，上海圣教杂志社 1929 年 5 月。
- (25) 徐宗泽：《三民主义节要》，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0 年 4 月。
- (26) 徐宗泽：《圣宠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0 年 9 月。
- (27) 徐宗泽：《天主教与妇女问题》，上海圣教杂志社 1925 年 10 月。
- (28) 徐宗泽：《心理学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0 年 10 月。
- (29) 徐宗泽：《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4 年 4 月。
- (30) 徐宗泽：《哲学史纲》，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0 年 4 月。
- (31) 徐宗泽：《社会经济学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4 年 5 月。
- (32) 徐宗泽：《社会学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 (33) 徐宗泽：《探原课本》，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6 年 4 月。
- (34) 徐宗泽：《天主造物论四末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 (35) 徐宗泽：《宗教研究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9 年 1 月。
- (36)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8 年 11 月。
- (37) 徐宗泽：《明清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9 年。
- (38) 徐宗泽：《妇女问题》，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0 年 1 月。

- (39) 徐宗泽:《天主三位一体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0 年 5 月。
- (40) 徐宗泽:《文定公徐上海传略》,上海圣教杂志社 1933 年。
- (41) 徐宗泽:《共产主义驳论》,上海圣教杂志社。
- (42) 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43) 赵石经:《徐汇纪略》,徐家汇土山湾印行 1935 年。
- (44)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 1901-1920》(上中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
- (45) 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

二、著作(以责任者姓氏拼音为序,同一责任者则按出版先后)

- (1) 段琦著:《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5 月。
- (2) (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1 月。
- (3) 傅乐安:《当代天主教》,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 (4) 顾保鹤:《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光启出版社发行 1970 年 12 月。
- (5) 葛社:《宗教与近代上海社会的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 9 月。
- (6)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 (7)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9 月。
- (8) (美)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 (9)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 (10) (奥地利)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1900-1950 年华人知识分子眼中的基督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
- (11) 罗秉祥、江丕盛:《基督宗教思想与 21 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 (12) (法)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8 月。
- (13)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 (14) 孙尚扬、刘宗坤著:《基督教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 (15) 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9 月。
- (16) 王治心撰,徐以骅导读:《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4 月。
- (17) 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9 月。
- (18) 吴利明著:《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变迁》,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7 年 9 月。
- (19) 谢扶雅:《基督教与中国思想》,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
- (20)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21) 张西平:《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 2001 年 8 月。
- (22)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23) 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 5 月。
- (24) 卓新平著:《基督宗教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9 月。
- (25) 卓新平主编:《基督教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

三、学位论文(以责任者姓氏拼音为序,同一责任者则按出版先后)

- (1) 徐峰:《南京国民政府宗教政策研究(1927-1937)》,山东师范大学 2001 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 (2) 吴静:《民国时期学位制度探析》,浙江大学 2001 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 (3) 李庆华:《马相伯思想述论》,山东师范大学 2002 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 (4) 周山彦:《马相伯的教育思想》,湖南师范大学 2003 年度硕士学位论文。
- (5) 王薇佳:《独辟蹊径: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研究(1903-1952)》,华中师范大学 2003 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四、论文(以责任者姓氏拼音为序,同一责任者则按出版先后)

- (1) 艾红红:《论中国近代报刊语言的言文合一趋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6 月。
- (2) 北溟:《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的“前世今生”》,《文化交流》2004 年 3 月。
- (3) 曹增友:《罗马教廷与中国教案》,《北京社会科学》2001 年 3 月。
- (4) 陈建明:《略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与适应》,《宗教学研究》2000 年 4 月。
- (5) 陈开华:《二十世纪汉语界的天主教传华史研究综述》,《中国天主教》,2004 年 3 月。
- (6) (美) 顾德曼(Bryna Goodman) 著,王儒年译:《上海报业文化的跨国性和区域性》,《史林》2003 年 1 月。
- (7) 顾卫民:《50 年来中国大陆有关基督教传华历史的研究》,《当代宗教研究》2000 年 3 月。
- (8) 顾卫民:《天主教东传与上海徐家汇地区》,澳门《文化杂志》2002 年夏季。
- (9) 顾卫民:《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历程》,《淡江史学》第九期抽印本。
- (10) (意) 乔凡诺里著,顾卫民译,沈保义、蒋士驹校:《本笃十五任教宗时期罗马教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近代中国》第六辑,上海中山学社主办。
- (11) 郭熹微:《黄一农及其明清天主教传教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0 年 2 月。
- (12) 胡道静口述,袁燮铭整理注释:《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史林》2001 年 4 月。
- (13) 胡卫清:《近代来华传教士与进化论》,《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 3 月。
- (14) 胡先媛:《从〈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看中西学术交流》,《四川图书馆学报》1996 年 6 月。
- (15) 黄常伦:《于斌主教》,《民国春秋》1999 年 3 月。
- (16) 黄书光:《马相伯宗教价值观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学术界》2004 年 1 月。
- (17) 黄志伟:《徐家汇藏书楼的东学西传文献》,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18) 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图书馆》,《新世纪图书馆》2003 年 6 期。
- (19) 刘乃和:《藏书最好的归宿——陈垣书的捐献与徐坊书的散失》,《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 年 3 月。
- (20) 李天纲:《新耶稣会与徐家汇文化事业》,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
- (21) 李天纲:《简论明清“西学”中的神学和哲学》,《复旦学报》1999 年 3 月。
- (22) 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史林》1999 年 4 月。
- (23) 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续)》,《史林》2000 年 1 月。
- (24) 李天纲:《徐家汇藏书楼与明清天主教史研究》,《相遇与对话: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9 月。
- (25) 孟庆:《上海宗教古今谈》(上、下),2000 年 2 月、3 月。
- (26) 秦和平:《失败的尝试:关于三四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传教方式探讨的思索》,见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 (27) 秦和平:《清代中叶四川天主教传播方式之认识》,《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 1 月。

- (28) 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年3月。
- (29) 沈晖:《苏雪林传略》,《江淮文史》2001年4月。
- (30) 沈继成:《试论19世纪在华传教士的报刊活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11月。
- (31) 苏雪林:《棘心》自序,群众出版社1999年。
- (32) 孙之梅:《南社与近代新闻报刊业》,《文史哲》2002年3月。
- (33) 宋巧燕:《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5月。
- (34) 汤开建、陈文源:《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学报》2002年5月。
- (35) 谭树林:《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2月。
- (36) 王世伟:《上海图书馆藏王重民先生手稿提要》,《国家图书馆学刊》2004年1月。
- (37) 王晓朝:《论基督教的本土化》,《学术季刊》1998年2月。
- (38) 魏扬波:《双城记:耶稣会在北京和上海的科学与教育》,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 (39) 王骅书:《陈垣史学思想的转变与成就》,《中州学刊》2002年5月。
- (40) 王宗法:《苏雪林论》,《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1月。
- (41) 武东亮:《略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时代特色》,《学术论坛》2000年1月。
- (42) 修彩波:《试论方豪的宗教史研究》,《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1月。
- (43) 修彩波:《读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华夏文化》2003年1月。
- (44) 修彩波:《方豪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3月。
- (45) 尤小立:《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孔教的两难取向探析》,《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4月。
- (46) 叶小文:《中国宗教的百年回顾与前瞻》,《中国天主教》2001年5月。
- (47) 叶兴艺:《刚恒毅:推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沟通》,《21世纪》2003年2月。
- (48) 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6月。
- (49) 杨慧林:《“本地化”和“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1月。
- (50) 周德全:《马相伯与天主教中国化》,《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4月。
- (51) 张雪永:《十九世纪末的中法文化交流述略(1860-1900)》,《天府新论》2003年2月。
- (52) 张雪永:《20世纪20年代的中法文化关系》,《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4月。
- (53) 张昭君:《民国时期基督教礼仪中国化改革的尝试》,《民俗研究》2001年4月。
- (54) 朱健华:《反思——中国近代报刊的重大主题》,《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4月。
- (55) 曾宪明、黄月琴:《论近代报刊与中国现代化意识的交互关系》,《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2月。
- (56) 赵玉华、刘凌霄:《清末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教活动的异同》,《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1月。
- (57) 皱振环:《近百年间上海基督教文字出版及其影响》,《复旦学报》2002年3月。

附录:

徐宗泽在《圣教杂志》中所发表文章名一览表

1924年	第2—5期	《哲学史纲》
	第10—12期	《哲学史纲》
	第5期	《对于近今妇女问题当知之原则》
	第8—9期	《宗教问题之商榷》
1925年	第1期	《第十四年之圣教杂志》、《统治权之原始》 《哲学史纲》(第1期—第11期)
	第2期	《教友当有之传教思想史》
	第3期	《教中的知识阶级宜洞明教理》
	第4期	《思想与行谊之关系》
	第5期	《灌输圣教观念》
	第6期	《圣教之对于国故观》
	第7期	《人生观》
	第8期	《我人对于现代思潮应持之态度》
	第9期	《推广教中小学之紧要》
	第10期	《教友思想》
	第11期	《教友性命》
	第12期	《教友良心》
1926年	第1期	《将来》、《十七世纪灌输西学之伟大》(第1—3期) 《亡灵在来世之处境》
	第2期	《培植教中领袖人物》
	第3期	《教中当有合作精神》
	第4期	《牺牲精神》、《中国学界之新旧思想》
	第5期	《社会化》、《知识论》
	第6期	《教育专刊发刊词》、《何谓教育》、《历史上之圣教学校概 观》、《历史上圣教教育精神》、《收回教育权评议》、 《几个学校问题》、《几个教育问题》、 《教育与宗教分离评议》
	第7期	《教宗新通谕之所训我教友者》、《自由的新名词》
	第8期	《新旧》、《归纳法》
	第9期	《恭颂天位本籍主教》、《宗教学》
	第10期	《编印圣教业书之我见》、《宗教学》
	第11期	《教育之一个注意点》、《宗教学》
	第12期	《墨化与讨墨》、《宗教学》
1927年	第1期	《中国传教事业之新经猷》、《宗教学》(第1—7期)
	第2期	《好恶》、《心象论》
	第3期	《大规模之圣召运动》
	第4期	《评论》
	第5期	《天主教是帝国主义吗》、《法律总论》
	第6期	《一个好试验》
	第7期	《教友今后之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的鸟瞰》

	第8期	<u>《能自动有进取之青年》</u>
	第9期	<u>《教育之我见》</u>
	第10期	<u>《十二八纪念周》</u> 、《天主教与近今之政党》
	第11期	<u>《我之有望于青年士女者》</u> 、《圣依纳爵之神操》、 <u>《圣多玛斯之超性学要译本》</u>
	第12期	<u>《努力下层工作》</u> 、《社会经济之释义》
1928	第1期	<u>《圣教杂志之主张》</u> 、《圣宠论》(第1—12期)
	第2期	<u>《今日之所谓平等》</u>
	第3期	<u>《今日之所谓自由》</u> 、《国内法》
	第4期	<u>《社会地生活素》</u> 、《国内法》
	第5期	<u>《圣教教育之曙光》</u> 、《社会经济概论》
	第6期	<u>《圣教书报之一好兆》</u> 、《社会经济概论》
	第7期	<u>《圣教青年之一好望》</u> 、《天主教与社会问题》
	第8期	<u>《苟安》</u> 、《天主教与社会问题》
	第9期	<u>《读教皇致中国人民电有感》</u> 、《天主教与社会问题》
	第10期	<u>《十二八二周年纪念》</u> 、《三民主义教育公评》
	第11期	<u>《祝圣惠主教志喜》</u>
	第12期	<u>《中华公教信友进行会喜闻》</u> 、 <u>《罗马教廷致中国通牒之分析》</u>
1929	第1期	<u>《教宗对中国传教之新猷》</u> <u>《全国教育会议与吾圣教教育之关系》</u> (第1—2期) <u>《圣宠论》</u> (第1—11期)
	第2期	<u>《教宗对于中国传教事务之纲要》</u>
	第3期	<u>《我之鼓吹司铎圣召观》</u>
	第4期	<u>《当今教宗晋铎五旬金庆》</u> <u>《罗马教皇国荣复之经过》</u>
	第5期	<u>《再论教育》</u> 、《澳门旧圣堂》、《新时代评论》
	第6期	<u>《统一经文笈议》</u> 、《罗马教宗》 <u>《广录陈谷川华侨地域观》</u>
	第7期	<u>《卷刊语(全国教务统计)》</u> 、《公教教育》
	第8期	<u>《劳工问题之解决法》</u> 、《康德派或名批评派》
	第9期	<u>《保禄宗徒传教法》</u> 、《保禄宗徒之妇女观》
	第10期	<u>《设圣教女子师范之紧要》</u> 、《三民主义之分析》
	第11期	<u>《青年劝》</u> 、《保禄宗徒之贞洁观》、《三民主义之分析》
	第12期	<u>《当今教宗五旬金庆感言》</u>
1930	第1期	<u>《本社之怀抱》</u> 、《人类之宗教信仰》 <u>《三民主义之分析》</u> (第1—11期) <u>《宠爱论》</u> (第1—9期)
	第2期	<u>《人类之宗教信仰》</u>
	第3期	<u>《教育权》</u> 、《译书论》
	第4期	<u>《国家与教育》</u> 、《世界宗教信仰之主要观念》、《徐 养田先生事略》
	第5期	<u>《教育当有之目标》</u>
	第6期	<u>《全国无天主教学校及当进行之一举》</u>

	第7期	<u>《怎样做一个教友》、《孙中山先生与教会》</u>
	第8期	<u>《天主学校不能放弃之三自由》、《宗教之定义》</u>
	第9期	<u>《教育可无宗教信仰吗》</u>
	第10期	<u>《天主教学校当有之准备》、《上海文定公与倭寇》、 《超性德能总论》</u>
	第11期	<u>《三民主义与天主教学校》、《社会学引言》、《超性 德能总论》</u>
	第12期	<u>《栽培编著人材》</u>
1931	第1期	<u>《本社之注意点》、《国家之任务》、《超性德能总论》</u>
	第2期	<u>《怎样做一个教友》</u>
	第3期	<u>《统一圣教会人名地名之译名》</u> <u>《家庭为国族民族之保障》</u>
	第4期	<u>《论天主教之教育权得产权》</u> <u>《有权者当知如何用权无权者当知如何服权》</u>
	第5期	<u>《教育职业化》</u>
	第6期	<u>《教皇良十三世劳工通牒四十周年纪念》</u> <u>《人民为国家负义务国家当保护其权利》</u>
	第7期	<u>《论投稿之我见》、《政府治民不能不知之事情》</u>
	第8期	<u>《民权》、《哲学浅谈》</u>
	第9期	<u>《自由平等》、《国际关系当知之原理》</u>
	第10期	<u>《多设公教学校以栽培人才》、《组成国家之核心》</u>
	第11期	<u>《严厉取缔不良刊物》、《国家进展之程序》、 《江苏省传教史略》</u>
	第12期	<u>《当怎样实行教皇良十三劳工通牒四十周年纪念》</u> <u>《各等社会之组成》</u>
1932	第1期	<u>《筹备三百五十年传教纪念周之我见》</u> <u>《圣方济各沙勿略眼中的日本》、《新思潮杂评》</u>
	第2期	<u>《惟有天主教之十诫能医人心病》</u> <u>《宗教之起源》、《新思潮杂评》</u>
	第3期	<u>《教友当有扶助传教之精神》</u> <u>《圣教会与个人与国家与国际之关系》</u> <u>《北平游记》（第3—7期）、《新思潮杂评》</u>
	第4期	<u>《基利斯当国民爱国心当根于基利斯督》</u>
	第5期	<u>《世界上有一超越的上智宰制群伦》</u>
	第6期	<u>《人有根于其性而来之所有权》</u>
	第7期	<u>《立国为民求福》</u>
	第8期	<u>《培植青年与传教之关系》、《遗产论》</u>
	第9期	<u>《教中小学当积极教授语体文》</u> <u>《劳动概论》、《新思潮杂评》</u>
	第10期	<u>《鼓勉教友热心社会事业》</u> <u>《劳动契约》、《新思潮杂评》</u>
	第11期	<u>《公理为造物主用以宰制群论》</u> <u>《工资概论》、《新思潮杂评》</u>
	第12期	<u>《人当怎样求真福》、《资本概论》</u>

1933	第1期	卷头语 《开教肇庆建堂三百五十周年奉教阁老去世三百周》
	第2期	《 <u>我国传教的新趋向</u> 》
	第3期	《 <u>风俗论</u> 》、《 <u>对于公教学校几个感想</u> 》
	第4期	《 <u>论译经</u> 》、《 <u>李之藻的名理探</u> 》 《 <u>经济学思想史概观</u> 》
	第5期	《 <u>勗公教进行会</u> 》、《 <u>经济学思想史概观</u> 》 《 <u>广设学校以提高教友社会上的地位</u> 》
	第6期	《 <u>全国祈祷总动员的我见</u> 》、《 <u>我们该当重视公教学校</u> 》 《 <u>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摘要</u> 》
	第7期	《 <u>组织社会之生活素</u> 》、《 <u>经济学思想史概观</u> 》
	第8期	《 <u>公教教士当怎样注意中国地方志</u> 》
	第9期	《 <u>天主教怎样解决社会问题</u> 》
	第10期	《 <u>奉教阁老的传略</u> 》、《 <u>奉教阁老与圣教</u> 》 《 <u>奉教阁老与家庭</u> 》、《 <u>奉教阁老与民族</u> 》 《 <u>奉教阁老之政治经济</u> 》、《 <u>奉教阁老与科学</u> 》 《 <u>奉教阁老著作的存佚</u> 》、《 <u>徐上海轶事</u> 》 《 <u>徐阁老的旧宅——九间楼</u> 》 《 <u>利玛窦以学问为传教之法</u> 》 《 <u>徐文定公轶事</u> 》、《 <u>徐文定公的子和孙男孙女</u> 》 《 <u>徐文定公遗迹、第宅园林、坟墓、宗祠、阁老坊</u> 》
1934	第1期	《 <u>提倡公教编译社的我见</u> 》
	第5期	《 <u>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彙编</u> 》
	第11期	《 <u>全国公教会急宜成立</u> 》
	第12期	《 <u>全国教友当有团体之组织</u> 》、信箱 三论弥撒
1935	第1期	《 <u>训练教友</u> 》 《 <u>明末清初西士与吾国学者所著书概论</u> 》 随笔 信箱：论刊物
	第2期	《 <u>训练教友知识</u> 》 随笔 信箱：论电影、论妇女服装
	第3期	《 <u>训练教友热心</u> 》、《 <u>这样做贤妻良母</u> 》 随笔 信箱：论罢工、论大小斋
	第4期	《 <u>训练教友之道德</u> 》 随笔 信箱：论圣事、论跳舞
	第5期	《 <u>训练教友工作</u> 》、《 <u>宗教为人类所必要论</u> 》 随笔 信箱：二论圣事：论圣洗
	第6期	《 <u>教友要充实自己</u> 》、《 <u>真教之寻索</u> 》 随笔 信箱：圣洗
	第7期	《 <u>我</u> 》、随笔 信箱
	第8期	《 <u>非我</u> 》、《 <u>近十年来天主教与我国之状况</u> 》 随笔 信箱
	第9期	《 <u>祝全国公教进行会代表大会</u> 》 《 <u>耶稣所立之罗马公教为真教</u> 》 随笔 信箱

	第10期	<u>《公教青年思想问题》</u> 、 <u>《洛阳游记》</u> 随笔 信箱
	第11期	<u>《洛阳游记》</u> 、 随笔 信箱
	第12期	<u>《罗马公教道理之研究》</u> <u>《洛阳游记》</u> 、 随笔 信箱
1936年	第1期	<u>《敬告爱护本志者》</u> 、 <u>《中国传教得力于学术之历史观》</u> 、 <u>《洛阳游记》</u> 、随笔 信箱
	第2期	<u>《公青年之训练》</u> 、 <u>《许缙曾奉事天主虔诚问题》</u> 、 <u>《对于公教报纸的感想》</u> 、 <u>《芜湖安庆途中的杂感》</u> 随笔 信箱
	第3期	<u>《训练公青思想》</u> <u>《天主教对于中国社会问题所演之实效》</u> 、随笔
	第4期	<u>《训练公青志愿》</u> 、 <u>《开封犹太教概论》</u> 、随笔 信箱
	第5期	<u>《训练公青道德》</u> 、 <u>《太平天国之宗教》</u> 、随笔 信箱
	第6期	<u>《训练公青作事》</u> 、 <u>《唐景教碑出土史略》</u> 、随笔 信箱
	第7期	<u>《传教总动员运动》</u> 、 <u>《唐景教论》</u> <u>《关于太平天国之几种书籍》</u> 、随笔 信箱
	第8期	<u>《训练教友传教》</u> 、 <u>《罗马教廷与蒙古通使史略》</u> 随笔 信箱
	第9期	<u>《元代之聶斯脱里异教》</u> 、 <u>《徐文定公毛诗六帖发现记》</u>
	第10期	<u>《提倡公教学校》</u> 、 <u>《徐文定公之科学观》</u> 、随笔 信箱
	第11期	<u>《吾人对于中国革新之希望》</u> 、 <u>《圣教经言有文学之价值》</u> <u>《罗马公教道德之研究》</u> 、 <u>《皈依罗马公教之程序》</u>
	第12期	<u>《本志二十五周年纪念》</u> 、 <u>《二十五周年之圣教杂志》</u> 、 <u>《李问渔司铎逝世二十五年纪念》</u> 、 <u>《李问渔司铎家属访问记》</u> 、 <u>《创办本志的潘秋麓司铎》</u> 、 <u>《二十五年来本志在思想界上之威权》</u>
1937	第1期	编者语
	第2期	编者语
	第3期	编者语
	第4期	编者语、 <u>《明末天主教之传入中国》</u> 、 <u>《杂谈菲律宾及马尼刺》</u>
	第5期	<u>《中国天主教——自利玛窦逝世至明末》</u> 、 <u>《马尼刺举行之第三十三届国际圣体大会》</u>
	第6期	<u>《中国天主教史——自清入关至康熙朝》</u> <u>《教皇庇护第十一世攻斥共产主义通牒意撮》</u>
	第7期	<u>《雍乾嘉道时之天主教》</u> <u>《教皇庇护第十一世致德国主教曹之通牒》</u>
	第8期	(专刊) <u>《墨井道人晋铎二百五十年纪念》</u>
	第9期	<u>《中国传教史之感想》</u> 、 <u>《中国传教史——自鸦片战争至今日》</u>
	第10期	<u>《抗战时期中吾人之祈祷》</u> 、 <u>《明清之际中国整个学术思想之革新》</u>

1938	第11期	<u>《对于战争我人应有之思想》</u> 、《战争与爱国》
	第12期	<u>《战争时期我人当有之盼望》</u> 、《天主上智亨毒中之战争》
	第1期	<u>《对于战争我们当抱乐观》</u> 、《战争论》 《少男少女在成年时期身心方面之变化》 信箱、随笔
	第2期	《何谓童贞》
	第3期	<u>《这样忍受痛苦心》</u> 、《国际关系论》
	第4期	<u>《怎样过耶稣复活瞻礼》</u> 《明清之际中国整个学术思想革新》
	第5期	<u>《三十四届国际圣体大会祝寿》</u> 、 《明清之际中国整个学术思想革新》
	第6期	<u>《公教公共和法西斯派反共底分别》</u> 、《崇祯历书》
第7期	<u>《中华民国之革新》</u> 、《中国文化西渐之介绍者》	
第8期	《马克思共产主义译述》、随笔	

注：有下划线的文章为每期杂志以“编者”署名的小短讯

科研成果

《简析近代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的中西文化观》，《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5月。

致 谢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首先感谢我尊敬的导师顾卫民教授，是他平实生动的教育把我引入了对中国近代天主教史的研究之中。由于资料的缺乏等原因，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存在很多的困难，但顾老师用其严谨的治学风格、踏实的做人态度教育我们，做学问应该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语言要平实，结论要简练准确。本文从选题、资料的收集、论文的撰写，到一稿、二稿、三稿……的反复修改，顾老师无不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即使在外出开会的情况下，仍经常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进行询问指导，还利用各种在国外出差的机会帮我们收集各种与论文题目相关的原始文献。顾老师平日教学任务繁忙，此外还有国家科研课题需要完成，各种学术研讨会需要参加等，但就是在这种忙碌劳累的情况下，顾老师仍不忘对于我们学习的监督和指导。顾老师这种认真的态度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学问，而且更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做人，这些对于身处校园的我们来说，都是受益终身的。

我一直有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希望通过本文的“完美”完成来报答顾老师的悉心教诲，但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了。虽然也花费了很多心血、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完成该文，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文章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足，离“完美”相差实在太远。无以回报导师，也只能再一次真诚的感谢顾老师勤勤恳恳的教诲和指导！

此外，我还要感谢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没有他们平日默默的支持和鼓励，我也是没有办法完成本文的。与老师和同学相处的三年里，他们都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使我对上海大学文学院这个大家庭感到温暖而熟悉。谢谢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父母是我精神永远的支柱！父母无私的爱让我感觉到人生的幸福和美好！家人时常鼓励我要坚强，教会我人生的道理，让我有机会享受三年的研究生教育，让我能安心学习。爱心无价，无以言报！

如果本文有什么闪光之处，我愿以此来感谢所有对我关心帮助的人。当然，对于本文所存在的差错和缺失，本人愿一并承担。

徐文华